

分类号 F83/643
U D C 0005830

密级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张鑫荣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黄萍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金融硕士

研究方向: 金融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3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鑫荣 签字日期： 2024年6月2日

导师签名： 黄萍 签字日期： 2024年6月2日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鑫荣 签字日期： 2024年6月2日

导师签名： 黄萍 签字日期： 2024年6月2日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easant household micro-credit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Gansu Province

Candidate: Zhang Xinrong

Supervisor: Huang Ping

摘要

2024年2月，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国面临着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小额信贷于1998年在国内正式推广，大量实践已经证明，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金融工具，农户小额信贷在破解农民贷款难、支持农村产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甘肃省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小额信贷产品和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小额信贷业务覆盖面逐步扩大，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如何进一步优化小额信贷政策、提高其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仍是摆在甘肃省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正是基于此来探讨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首先，文章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并对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和农民收入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其次，为更全面地反映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通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相关评价体系，得到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在此基础上，选择其他六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甘肃省14个市州2013-2022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总体呈稳定的增长态势，且各地市之间存在差异性；二是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总体显著，但对不同类别收入的影响效果有别；三是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存在地区差异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一是优化小额信贷地区分布，促进均衡发展；二是细化小额信贷服务，提升增收效果；三是加强欠发达地区信贷支持，助力农民增收。

关键词：乡村振兴 农户小额信贷 农村居民收入

Abstract

In February 2024, the 12th Central Document No. 1 guiding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issued, providing a clear action guide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hina faces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income growth for farmers and driv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icro-credit, officially promoted in China in 1998, has been proven through extensive practice to be a flexible and effective financial tool tha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ddressing farmers'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loans and supporting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Gansu Provinc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improving the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innovating micro-credit products and services. Especi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levant policies, the coverage of micro-credit business has gradually expanded,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farmers.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omplex and volatil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how to further optimize micro-credit policies and enhance their effectiveness in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remain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Gansu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rural household micro-credit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Gansu Province.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farmer micro-credit on farmers' income from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aspect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armer micro-credit and farmers'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Next,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micro-credit in Gansu Province, the relevant evaluation system is referred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of rural household micro-credit in Gansu Province, on this basis, the other six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variables, using data from 14 cities and prefectures of Gansu Province from 2013-2022 as samples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The main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household micro-credit in Gansu Province shows a stable growth trend,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seco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rural household micro-credit in Gansu Province on the increase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s generally significant, but the influence effect o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income is different; third,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of rural household micro-credit on farmers' income growth in Gansu Provinc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we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irst, to optimize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icrofinance to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second, to refine the service of microfinance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income

increase; third, to strengthen credit suppor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help farmers increase their income.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Peasant household micro-credit;Rural resident income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2
1.2.1 农户小额信贷的相关研究	2
1.2.2 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关研究	4
1.2.3 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6
1.2.4 文献述评	8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9
1.3.1 研究方法	9
1.3.2 研究内容	9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1
1.4.1 研究的创新点	11
1.4.2 不足之处	12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3
2.1 概念界定	13
2.1.1 乡村振兴战略	13
2.1.2 农户小额信贷	13
2.1.3 农村居民收入	14
2.2 理论基础	14
2.2.1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14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15
2.2.3 农村金融抑制理论	16
2.2.4 普惠金融理论	16
2.3 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17

2.3.1 直接影响	17
2.3.2 间接影响	18
3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及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20
3.1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现状	20
3.1.1 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整体呈增长态势	20
3.1.2 农户小额信贷供给主体及规模不断扩大	22
3.2 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24
3.2.1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	24
3.2.2 各类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同	25
4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评价指数测度	33
4.1 小额信贷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	33
4.1.1 指标体系设计	33
4.1.2 测度方法	35
4.2 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测度	36
4.2.1 数据处理与指标计算	36
4.2.2 结果分析	37
5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5.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41
5.1.1 指标选取	41
5.1.2 数据来源	44
5.2 模型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44
5.2.1 模型选取	44
5.2.2 模型构建	45
5.2.3 描述性统计	45
5.3 变量检验与模型回归	46
5.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46
5.3.2 平稳性检验	48
5.3.3 模型回归与分析	50

5.3.4 稳健性检验	54
5.3.5 异质性分析	55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9
6.1 研究结论	59
6.2 对策建议	60
6.2.1 优化小额信贷地区分布，促进均衡发展	60
6.2.2 细化小额信贷服务，提升增收效果	60
6.2.3 加强欠发达地区信贷支持，助力农民增收	61
参考文献	62
致谢	68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不断优化和创新,为农民提供了更加便捷、更加高效的资金支持。2024年2月,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路线图”。文件指出,要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强化农民增收举措,防止规模性返贫。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村小额信贷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改革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国自1993年首次将小额信贷这个概念引入农村金融市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小额信贷已经成为农民获得贷款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村小额信贷的引入和发展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小额信贷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为农民提供了及时、有效的金融支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村小额信贷的作用更加凸显。一方面,小额信贷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了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例如,在一些贫困地区,通过小额信贷的支持,农民可以发展特色种植、养殖等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另一方面,小额信贷还推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农村金融服务优化,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并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商业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发挥了中坚力量,为农民提供了更加广泛、便捷的金融服务。随着政策的持续深化和市场的不断拓展,农村小额信贷将继续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小额信贷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可以为农民创造更多增收机会,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实现持续、稳步发展。

1.1.2 研究意义

小额信贷模式这一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认为能够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扶贫手段，自 1993 年引入我国以来，得到了大力的推动与发展。伴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与支持，小额信贷在农民收入增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甘肃省为例，深入探究小额信贷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具体影响，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远意义，更在现实层面具有指导价值。

(1) 理论意义

通过对甘肃省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关系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小额信贷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状况和小额信贷发展态势的理解，同时也为国内外关于小额信贷与农村金融环境相互影响的理论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依据。此外，基于甘肃省的实证研究，还可以为国家层面在制定小额信贷政策和优化农村金融环境时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2) 现实意义

从现实层面来看，对甘肃省小额信贷水平影响农民收入的深入分析，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首先，这一研究能够为小额信贷模式在其他地区的推广应用提供有益的借鉴，特别是在农村金融环境的持续优化方面。其次，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从而为进一步拓展农村金融的发展空间提供实证支持。最后，这一研究还有助于为甘肃省农民增收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2 文献综述

1.2.1 农户小额信贷的相关研究

(1) 小额信贷的内涵与发展

小额信贷的本质是要为贫困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持，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孟加拉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引入我国之后，吸引了社会各界学者的探讨研究。杜晓山（2009）认为小额信贷应该主要为面临风险的非贫困者、贫困者

和极度贫困者三个群体服务,从而实现将金融服务覆盖到大多数贫困人群的目标。杜晓山(2012)还认为,随着小额信贷产品的不断丰富,将会推动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户小额信贷作为小额信贷的产品之一,李秀辉等(2019)研究其在我国30多年的发展经历后,提出我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可以总结为低迷期、扩宽期、多样期和衍生期四个阶段。

学界普遍认为小额信贷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Shirish Mishra等(2017)强调,小额信贷不仅为农民提供了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激活农村市场,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小额信贷为农村经济的整体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Bogan(2012)和Assefa等(2013)的研究则聚焦于政府在小额信贷发展中的角色。他们指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注入和有效监管,政府可以确保这些机构为农民提供持续、可靠的金融服务,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张云燕等(2023)通过入户实地调研研究陕西省农村妇女小额信贷状况,结果显示小额信贷的发展能够增加农村妇女的生产经营收入。崔巧琳等(2023)认为,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县域小额信贷将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周明栋(2018)认为,由于小额贷款的发展速度过快,应该建立健全信用体系,降低担保在小额贷款中的作用,进而实现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李丽慧等(2021)认为影响小额信贷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环境、政策制度、管理方式和信用。

(2) 小额信贷发展存在的问题

小额信贷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探讨。苏冬蔚等(2019)认为小额信贷有着部分政策性贷款的特点,由于政府的参与,使得难以对其进行规范的管理,因而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尹晓东(2018)指出,在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银行如农商行、信用社等,由于客户群体本身的特点:信用意识不高、还款意愿相对较低,易受自身有限的管理方式管理水平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增加其信贷风险。Rose A. G(2019)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水平、资金的用途、贷款的利率等因素都会影响小额贷款的信贷风险。Adrian(2020)指出,小额贷款受到外部经济环

境、金融环境以及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些因素间接导致贷款人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小额贷款，从而增加了违约风险。白志红（2020）认为我国农户小额信贷业务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积累不足，主要包括：经营机制不完善、网点配置不合理、信贷产品不创新、征信体系不健全等。李胜连等（2022）指出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着风险控制难度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不足等问题。苏雪等（2023）指出，贫困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服务覆盖不足，导致贫困人口难以获得有效的信贷支持。此外，由于贫困人口的金融素养普遍较低，缺乏利用信贷资源的能力，也制约了信贷扶贫政策的效果。

（3）针对小额信贷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如何解决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单光年（2020）从如何提高小额信贷风险防控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优化信贷管理模式、健全人员管理机制等，从而有效提高小额信贷风险防控的效率。Giammarino M（2019）认为，针对小额信贷组织实施的全国联保体制是提高借款客户还款率的重要保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信贷机构的资产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尹晓东（2018）建议中小银行及农商行等应该将贷款人管理作为小额信贷风险防控的重点工作，在健全内部管理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贷款保险，加强风险防控。杜青青（2022）在研究世界各国在小额信贷风险管控的成功案例后，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她认为进行小额信贷风险管理时，应该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通过在贷款前、贷款中和贷款后的全流程管理，可以有效地避免各种风险。刘芳（2017）通过研究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有关农村金融反贫困的成熟案例后，总结了一些国外金融减贫的经验启示，主要包括：强化服务目标、创新信贷技术、开发信贷产品、利用社会资本等。王婧（2022）的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同门槛值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1.2.2 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关研究

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二是抑制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

（1）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学者们有以下探讨：Schmied 等（2016）在研究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农民群体获取信贷服务的成本，成本的降低不仅提高了农民的资金可及性，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创业可能，从而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并减少贫困。Mohammed 等（2017）也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将之前被忽视的农民群体纳入服务范畴。这种覆盖率的提升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还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黄烨炜等（2023）利用农村土地抵押贷款政策试点作为实验，选取 2014 年至 2019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农村土地抵押贷款政策试点县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土地抵押贷款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Chen 等（2021）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本，尤其是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规信贷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Park 等（2018）通过对 37 个亚洲经济体的进行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村经营主体的资金可及性，还增强了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和经济周期变化带来的挑战。Peterson（2017）在研究数字金融时指出，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低收入者和非固定收入者获取正规银行金融服务的成本，进而促进普惠金融和金融稳定性。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农村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张良等（202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贾超（2023）以农村电商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层面对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他利用 2014-2020 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实证模型，对我国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农村人力资本在农村电商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丁可可等（2024）研究发现，乡村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产品流通和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等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不同地区间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也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异质性。

（2）阻碍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

关于阻碍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学者们也有以下探讨。Aku 等（2018）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有限的市场信息和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成为了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障碍。市场信息的有限性意味着农民往往无法准确了解市场的需求和价格变化，这导致他们在销售农产品时难以获得最优的价格。同时，由于缺乏对市场趋势的了解，农民在生产决策上也存在较大的盲目性，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经营风险。Golley 等（2011）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认为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城乡分割体制，由于收入低下，农村居民难以进行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培训等，这又反过来限制了他们提高收入的可能性。汪为等（2024）指出了农民持续增收面临的主要瓶颈，包括农民务工增长乏力、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程度偏低、农业生产性配套服务不足等都限制了农民的增收空间。纵玉英等（2018）从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哪个层面，农村金融发展都似乎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换句话说，尽管农村金融业务不断发展，但这并没有带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程欣（2023）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她指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主要包括：农村现行的宅基地制度和土地经营制度、农村金融信贷业务的发展滞后、农村多元化产业发展的不足、农民自身的金融素养和理财能力等。黄文博（2018）通过大数据分析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突显金融发展与农民实际增收之间的悖离。肖远飞等（2020）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抑制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发展。

1.2.3 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有着广泛的研究，但因受制于研究课题、研究视角、地区发展等不同情况，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类别：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不能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1）农户小额信贷能促进农民增收

MOHUMMED SHOFI ULLAH MAZUMDER 等（2015）指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改善了穷人的生活条件，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进而增加了他们的收入。Apriani Dorkas Rambu Atahau 等（2020）认为，通过良好的治理支持，小额信贷机构可以实现向绿色发展的平稳过渡，这不仅有助于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农户对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融资需求。Rahman 等（2019）研究发现，农户在利用小额信贷后，家庭资产得到显著提升，生计状况和粮食安全得到明显改善。这表明小额信贷在提升农户生计能力和改善家庭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Dahal 等（2020）探讨了小额贷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影响，他们发现，小额贷款作为一种金融服务工具，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减轻贫困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谢玲红等（2022）认为中国扶贫贷款的发放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财政精准扶贫策略。它在推动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内在发展活力提供了巨大动力。张梦林等（2022）的研究中深入探讨了扶贫小额信贷对低收入农户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这种信贷方式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了更多获取正规信贷的机会，从而有效缓解了这些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刘赛红等（2021）指出，信贷支持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农村产业融合情况紧密相关。当农村产业融合达到一定程度时，信贷支持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反之，如果农村产业融合不足，信贷支持的作用可能会受到限制。闫杰等（2022）的研究不仅证实了小额信贷在促进贫困户收入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揭示了市场化程度和政府金融机构参与对于提高扶贫效果的重要性。张宜等（2023）指出，通过扶贫小额信贷，可以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资金需求问题，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同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扶贫小额信贷作为一种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方式，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农户小额信贷不能促进农民增收

Mukherjee（2014）指出，小额信贷机构通常更倾向于服务有工作的低收入群体，但在特定情况下，极端贫困的借款人仍然有可能获得信贷。这可能是由于一些小额信贷机构出于社会责任或政策要求的考虑，为这部分群体提供了一定的信贷支持。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且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信贷条件和风险。余洁等

(2020)通过剖析小额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层次性差异,发现对于那些已跨越中等收入门槛的农户而言,小额信贷如同一剂强心针,显著提升了其收入水平,并且这种提升随着农户原始收入的增加而变得更为显著。但对于仍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下挣扎的农户来说,小额信贷的增收效应并不明显。温涛等(2016)指出,当农村小额贷款资金进入乡村时,往往存在一种“精英俘获”的现象,这是因为在乡村社会中,那些有稳定工作和较高收入的农户通常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他们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青睐和信任。而对于那些贫困农户来说,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从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武丽娟等(2019)从贫困农户的资金使用角度出发,认为如果贫困农户更倾向于将资金储蓄起来,而不是进行有效的投资以获取更高的收益,那么仅仅依靠脱贫补助来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将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贫困农户可能会面临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贺立龙等(2018)通过对农村小额信贷的供需状况进行分析,认为信贷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贫困农户脱贫,但在引导贫困农户实现生产脱贫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王汉杰等(2019)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我国特困地区农村的信贷情况。他们观察到,当大量的正规和非正规信贷资源涌入这些地区时,这些信贷资金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对农民的经济状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加剧了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1.2.4 文献述评

通过从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综合梳理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对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还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借鉴,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从研究对象看,当前国内的研究对象大都是从全国范围或某一地县的研究,对省域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农村分布更广的西部地区省份的研究更少;二是从研究方法看,在研究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时,多数研究往往聚焦于单一的小额信贷数额或是农民总收入,缺乏对小额信贷水平的深入剖析和农民收入构成的全面考虑。

基于以上文献的研究基础和存在的不足,本文选择农村分布更广、更具代表

性的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从甘肃省各市州的市级数据出发，参考已有成果选取多个指标构建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可以更为全面地衡量一个地区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同时根据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将农民收入的六个种类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为基础，选取其余六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1.3.1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本文通过回顾大量国内外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关学术资料，全面掌握了其发展现状，并加深了对小额信贷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发展实际，研究两者的关系。

(2) 比较研究法：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各种变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揭示了不同因素的差异性影响，为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有助于为实现农民增收精准施策。

(3) 理论与实证结合法：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究了农村小额信贷问题。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和处理分析实证数据，提升了论证力度，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1.3.2 研究内容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本文依托现有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深入剖析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及农村居民收入的现状，构建了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并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文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具体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分别从农户小额信贷、农村居民收入以及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介绍了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本文要做的工作；第三部分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介绍了本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第四部分是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阐述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本章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念界定，对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农户小额信贷、农村居民收入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重点梳理了本文所需的理论基础，如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等，为后续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依据；第三部分是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章：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及农村居民收入的现状分析。本章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现状，对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从发展态势和发展规模两方面进行了介绍和梳理；第二部分为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分析，从时间序列和收入结构两方面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现状进行了分析。

第四章：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测度。本章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小额信贷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第二部分是小额信贷水平指数测度，这两部分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小额信贷水平评价体系，更为全面地体现甘肃省小额信贷发展水平，计算了甘肃省各市州小额信贷水平指数，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第五章：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节基于上一章节所构建的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进一步利用经过相关检验的样本数据，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通过这一模型，我们探讨了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对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第六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结论，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第二部分是对策建议，针对上文的现状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此促进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以及在助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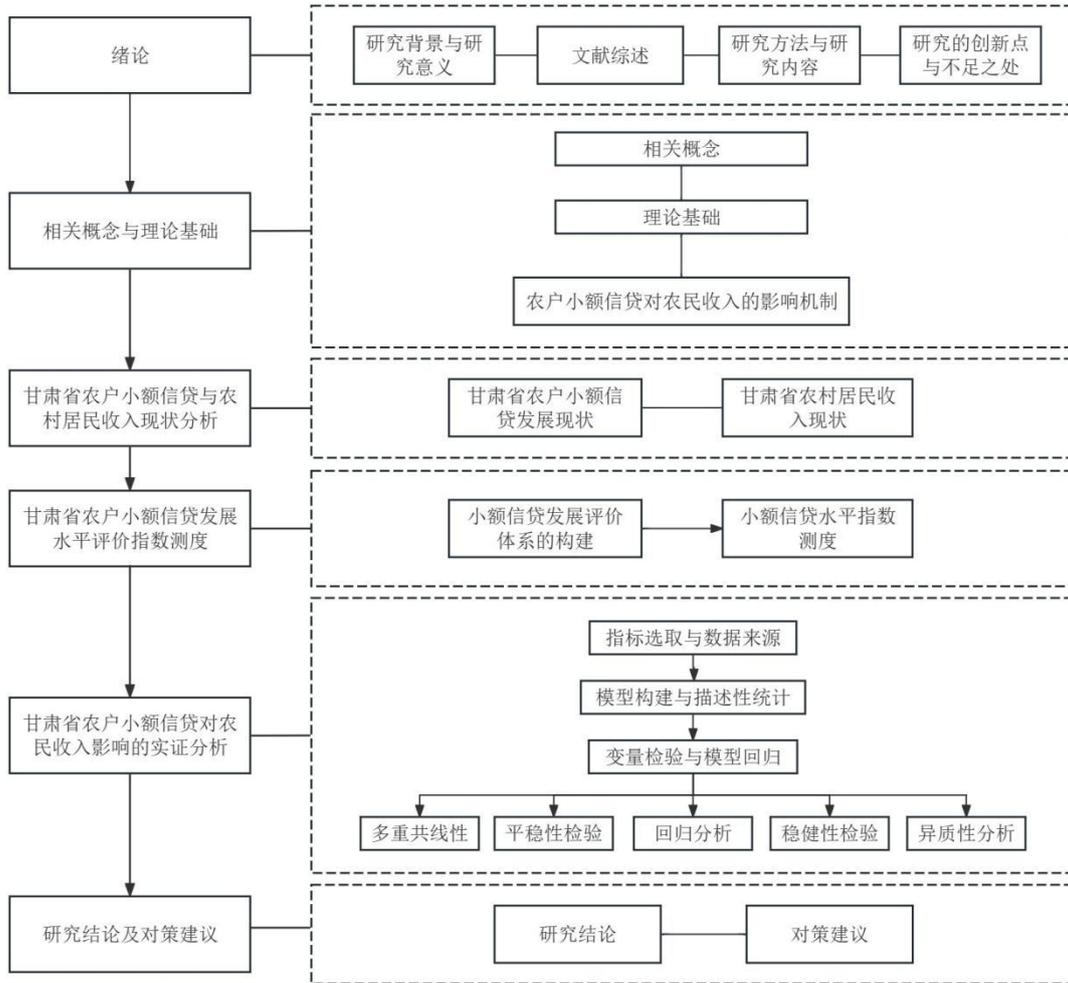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4.1 研究的创新点

本文研究的是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通过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后总结相关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存在以下创新点：

(1) 研究对象创新。关于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且对农村人口更多、农村分布更广的西北地区的研究较少。甘肃省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西北地区农村的发展情况，

因此本文从中观角度出发，选择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对其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创新。多数学者在研究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时仅以小额信贷数额这单一指标进行分析，但本文认为小额信贷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单纯依据小额信贷数额这一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小额信贷发展的真实状况。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以此来衡量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情况。

1.4.2 不足之处

本文在研究农户小额信贷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时，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主要采用了市级数据进行分析，无法从更微观的层面深入探讨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区域宏观的层面，未能更深一步挖掘小额信贷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具体路径和机制。

第二，指标选取不太全面。尽管我们尽力选取了能够反映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情况的指标，但仍有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导致对小额信贷发展的描述不够准确和全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战略，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指引。该战略的实施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广大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回应。习近平主席在报告中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即提高农民收入，缩小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确保农民能够与城市居民同步增长收入，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一目标的提出，体现了国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定决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遵循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方针。其中，产业振兴被视为关键所在，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构建乡村产业体系等措施，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方面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全面图景。

2.1.2 农户小额信贷

农户小额贷款的概念最早大约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孟加拉国，为了满足当地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者的金融需求，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推出了无需担保的农户小额贷款业务，这一创新性的金融服务模式很快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我国，早期的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主要是为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咨询、存款、贷款等金融服务，其中存款服务主要是为客户开设个人账户，并根据客户需求向客户提供储蓄和交易服务；贷款服务则是为满足客户的日常生产和消费需求，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深化，农户小额贷款业务在我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农户小额贷款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服务产品，具有两大核心特性。首先，从

金融层面来看，它有助于确保银行的稳健运营与持续发展。通过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银行能够分散风险，降低信贷集中度，从而增强自身的稳健性。小额贷款业务也能够为银行带来稳定的利息收入，有助于其持续发展。其次，从公共角度出发，农户小额贷款能显著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有效缓解他们的资金困境，进而改善其生活质量。对于许多农民来说，缺乏资金是制约其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获得小额贷款，农民能够购买生产资料，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经济收入。这两大特性共同构成了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区别于银行传统金融信贷产品的根本所在。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往往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或担保，且贷款额度较大，审批流程繁琐。而农户小额贷款则更加灵活便捷，通常采用信用贷款方式，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贷款额度较小，审批流程简化。这使得农户小额贷款更加贴近农民的实际需求，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金融需求。

2.1.3 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是一个综合概念，通常指的是农村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即从各种来源获得的收入总和，在扣除相关费用支出后所剩余的货币量。这些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农业收入，即农民通过出售土地上的农产品所获得的报酬；以及非农业收入，如打工、兼职等劳动所得或其他资金回报。从收入渠道来看，农民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其中，经营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作物种植；工资性收入则是通过出卖智力或劳动力获得；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房产和土地的出租，但由于土地和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制，因而通常较低，而转移性收入则主要是国家和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和补贴。

2.2 理论基础

2.2.1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金融市场论崭露头角，逐渐取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的主导地位。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倡导完全的市场机制，并反对政府的干预。它坚信市场力量能够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而政府的参与往往会导致市场对外部

资金的过度依赖，进而降低存款的回收率。农村金融市场论认为，农民和贫困人群具有潜在的储蓄能力。只要为他们提供储蓄的机会，即使在没有外部资金注入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够积累起可观的资金。因此，该理论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农村资金，提高信贷的回收率，并确保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农村金融市场论对低息政策持批评态度。它认为低息政策不仅无法有效提高储蓄率，反而会抑制人们的储蓄意愿和金融发展。相反，市场决定的利率能够更好地反映资金的真实成本，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高息被视为是对其经营成本的合理补偿。

尽管农村金融市场论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在实际应用中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农民仍然面临着从正规融资市场中获得足够信贷的难题。虽然放开的利率可能会降低整体贷款需求，使得农民的贷款门槛相对较低，但由于贷款成本高昂和缺乏合适的担保物，农民往往难以获得所需的全部资金。因此，在追求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仍然需要发挥一定的作用来保护农民的权益。这意味着在农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找到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点，以确保农民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并推动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也不容忽视，它们可以作为桥梁和纽带，连接农民与金融市场，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和机会。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它深入剖析了市场交易中不同参与者因信息掌握程度差异而引发的种种现象。这一理论明确指出，由于信息来源、文化水平、数据分析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市场中的各个参与者对信息的了解并不均等。那些掌握更丰富、更准确信息的人员往往能在交易中占据有利地位，而信息相对匮乏的人员则可能遭受损失或处于不利境地。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该理论深刻揭示了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固有缺陷，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的市场中，这种缺陷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市场失衡以及不公平交易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部分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也可能对整个市场的稳定性和效率造成威胁。其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迅猛发展，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变得愈发

重要。信息不对称理论强调了信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在价格形成、市场竞争、消费者行为等方面。这一理论提醒我们，信息的流动和传递机制对市场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最后，信息不对称理论强调了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作用。该理论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法规、推动信息公开等手段，努力减轻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市场失灵、经济波动等。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和宏观调控，可以推动市场主体间的信息相对对称，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2.3 农村金融抑制理论

基于国外对农村金融抑制理论的研究，我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抑制论点。这一理论强调，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民往往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在这些地区的贷款利率通常较高。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出于盈利考虑，更倾向于将贷款投放给城市的企业和居民，以及那些经济效益佳、偿债能力强的乡镇企业。

农村金融抑制不仅加剧了农民贷款的难度，还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在部分发达城市的地区，金融服务供过于求，且质量上乘，然而在农村，广大农民和乡镇企业却面临金融支持的缺失。这种不平衡导致他们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进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通过农村信用社等渠道为农民提供低利率的小额信贷服务，这些服务专门针对农户设计，旨在缓解他们的贷款难题。除此之外，一些农户还会选择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寻求小额信贷，以弥补正规金融渠道的不足，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抑制问题，但也凸显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待完善之处。

2.2.4 普惠金融理论

普惠金融是一个以公平和可负担的方式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理念。这些群体由于种种原因，常常被主流金融服务所忽视，而普惠金融的目标就是要填补这一空白，确保他们也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的权益。普惠金融不仅致力

于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它鼓励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那些最贫困的人群，都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从而实现更广泛、更公平的经济增长。正因如此，普惠金融被看作是推动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动力。

根据普惠金融理论，金融机构有责任以可负担的成本向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对于那些因信贷限制而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的贫困人群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普惠金融的缺失意味着金融市场的繁荣可能并不会直接惠及这部分人群，他们可能会因此陷入持续的贫困和低收入循环中。同样地，小微企业也可能因为资金不足而无法稳定发展或扩大规模。在实践中，普惠金融通常通过小额信贷机构等渠道来提供贷款和其他基础金融服务。这些服务不仅为贫困人群和小微企业提供了获得资金的理论支持，还在宏观层面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额信贷作为普惠金融的一种重要形式，已经成为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扶贫工具。

2.3 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2.3.1 直接影响

(1) 提供生产资金，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农业生产周期长、投资大、见效慢且风险高的特点使得农民在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技术等方面常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小额信贷的介入，为农民提供了便捷、灵活的资金支持，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瓶颈问题。通过小额信贷，农民可以购买更多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机械化水平，从而增加农业产量和产值。产量的提升直接带动了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进而提高了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2) 缓解生活压力，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农民在面临疾病、灾害等突发事件或季节性收入波动时，往往需要通过借贷来应对生活支出。小额信贷以其灵活、便捷的特点，成为农民应对生活困境的重要工具。通过小额信贷，农民能够及时获得资金支持，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婚丧嫁娶等必要支出，保障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小额信贷还为农民提供了应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

的能力，降低了因风险导致的收入波动和贫困风险。

(3) 支持农村工商业发展，拓宽农民收入来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涉足非农产业，如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等。小额信贷不仅支持农业生产，还为农民提供了开办小规模农村工商业的资金支持。农民可以利用信贷资金购买设备、租赁场地、拓展市场等，推动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农村工商业的兴起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有效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通过参与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农民可以获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多种形式的收入，从而提高整体收入水平。

2.3.2 间接影响

(1) 提升农民金融素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小额信贷的普及和推广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农民在申请和使用信贷资金的过程中，需要了解金融知识、掌握借款技巧、规划还款计划等。这些过程有助于提升农民的金融素养和信用意识，使他们更加理性地对待借贷行为，降低借贷风险。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农民能够更好地利用金融市场资源，把握市场机遇，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从而间接促进收入的增长。同时，金融素养的提升还有助于农民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包括市场信息获取能力、生产经营决策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等。这些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农民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

(2) 改善农村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小额信贷的发展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和透明度。随着小额信贷机构的增多和服务范围的扩大，农民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减轻农民的利息负担。降低融资成本意味着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实际资金支持，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改进生产技术等方面，从而间接提高收入水平。此外，良好的金融环境还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为农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不同农民的需求，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满意度。同时，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还有助于提高农民对金融服务的信任度和使用意愿。信任度的提高可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使农民更愿意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支持。这有助于抑制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发展，减少农民因高利率、高风险借贷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3)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小额信贷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工商业发展，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村地区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这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回流农村，促进农村人口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间接提高收入水平。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将带动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社会事业的进步，为农民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这些变化将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3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及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甘肃省，简称“甘”或“陇”，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兰州市，位于中国西北地区，东通陕西，西达新疆，南瞰四川、青海，北扼宁夏、内蒙古，西北端与蒙古接壤，总面积 42.58 万平方千米。甘肃省下辖 12 个地级市、2 个自治州，合计 14 个地市级行政区。根据甘肃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截止 2022 年末，甘肃省的总人口达到了 2492.42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数量为 1350.64 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 54.19%。

3.1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现状

3.1.1 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整体呈增长态势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在 1993 年引进了小额贷款，自此小额贷款业务开始在中国发展，并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扶持。2001 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并确立了小额信贷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农信社便在此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为广大农户提供了便捷、灵活的金融服务。甘肃省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农业省份，也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当前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供给方较多，除了农信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正规银行业金融机构之外，还有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但截止到 2023 年 9 月，甘肃省农信社的涉农贷款数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 63%，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数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 37%，甘肃省农信社已经成为推动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名副其实的主力军，也是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后续将主要从甘肃省农信社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状况。甘肃省农信社自 2002 年正式开始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这一举措为甘肃省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图 3.1 2010-2022 年甘肃省涉农贷款总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甘肃金融年鉴》及甘肃省农信社官网

如图 3.1 所示，2010 年至 2022 年甘肃省农信社涉农贷款规模整体上呈增长态势，从 2010 年的 7216400 万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3590800 万元，13 年间增长了 226.91%。从整体上看，甘肃省农信社涉农贷款增长率在 2012 年达到了最高点，在此之后增速开始逐渐放缓，在 2019 年达到最低点，2019 年受全国突发卫生事件的影响，甘肃省农信社相比之前又加大了对涉农贷款的投入，因此从 2010 年开始增速有所回升并逐步保持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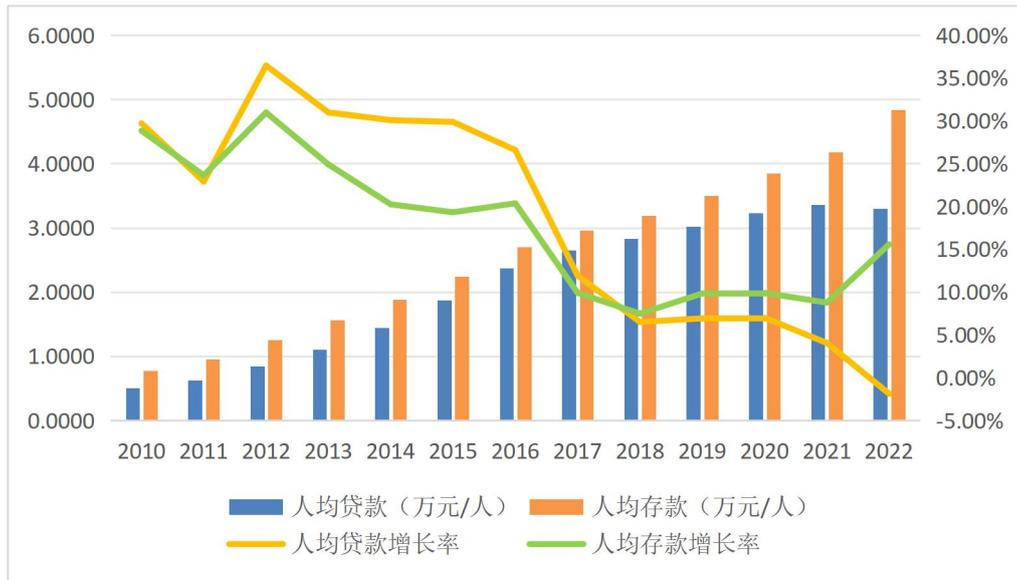


图 3.2 2010-2022 年甘肃省农信社人均存贷款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甘肃金融年鉴》及甘肃省农信社官网

从图 3.2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甘肃省农信社的人均存贷款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从 2010 年到 2022 年，人均存款从 7726 元增加到 48343 元，增长了 6.26 倍，而人均贷款也从 5050 元增加到 33016 元，增长了 6.56 倍。这一增长幅度相当可观，反映了甘肃省农村金融服务的普及和深化。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存贷款的增长率在 2012 年达到了近 13 年来的峰值。存贷款的增长率趋势整体相似，这表明存贷款之间相互影响。当农户收入增加时，他们在农信社的存款也会相应增加，从而提高了农信社的贷款能力，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存贷款数额近年来持续稳定增加，尽管其增长率有所放缓，但整体趋势逐步趋于平稳。这一趋势预示着甘肃省农村金融市场的成熟和稳定，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3.1.2 农户小额信贷供给主体及规模不断扩大

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供农户小额贷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显著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更肩负着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使命。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以其广泛的网络覆盖、庞大的业务规模、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以及优质的服务水平，为农村金融

市场树立了典范。2022年，甘肃省农信社为甘肃省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达3769.69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支持，为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的资金动力。近年来，为降低信贷风险同时改善经营状况，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在业务策略上进行了调整。它逐渐将重点从小额信贷转向大客户信贷，并提高了信贷门槛，加强了信贷程序的规范性。这些举措不仅优化了甘肃省的农村金融环境，也确保了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表 3.1 2010-2022 年甘肃省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规模（家）和资产总额（亿元）

年份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计	
	网点规模	资产总额	网点规模	资产总额	网点规模	资产总额
2010	16	20	2087	1343	2103	1363
2011	31	24	2269	2097	2300	2121
2012	19	40	2184	2689	2203	2729
2013	43	59	2242	3252	2285	3311
2014	20	88	2269	3889	2289	3977
2015	69	116	2300	4401	2369	4517
2016	407	300	2312	5057	2719	5357
2017	418	157	2288	5527	2706	5684
2018	60	336	2242	5608	2302	5944
2019	60	336	2238	6241	2298	6577
2020	68	204	2158	6353	2226	6557
2021	89	222	2131	6795	2220	7017
2022	89	238	2072	7756	2161	7994

数据来源：2010-2022年《甘肃省金融运行报告》

农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农信社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助力。在甘肃省的农村金融的发展进程中，金融机构的数量逐渐增多，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服务水平也在显著提升，金融机构在为农户提供资金保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几年，甘肃省各金融机构纷纷精简信贷流程，逐步把重点聚焦农村、农民的信贷资金可获得性，同时不断降低信贷约束，使得甘肃省农村金融环境大大优化。表 3.1 表明甘肃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的网点规模和资产总额的变化情况。

3.2 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3.2.1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

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农村居民收入，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政府将“三农”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通过连续多年的政策支持，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扶持力度。甘肃省同样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深化。随着甘肃省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农民不再单纯依赖传统农业和天气条件来决定收入，而是积极拓展致富渠道。其中，通过发展农家乐等第三产业获得的经营性收入、种植水果花卉等生产性收入以及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升。近年来，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保持在8%左右，显示出稳定且持续的增长趋势。同时为进一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国家相继出台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保险等一系列惠民政策，为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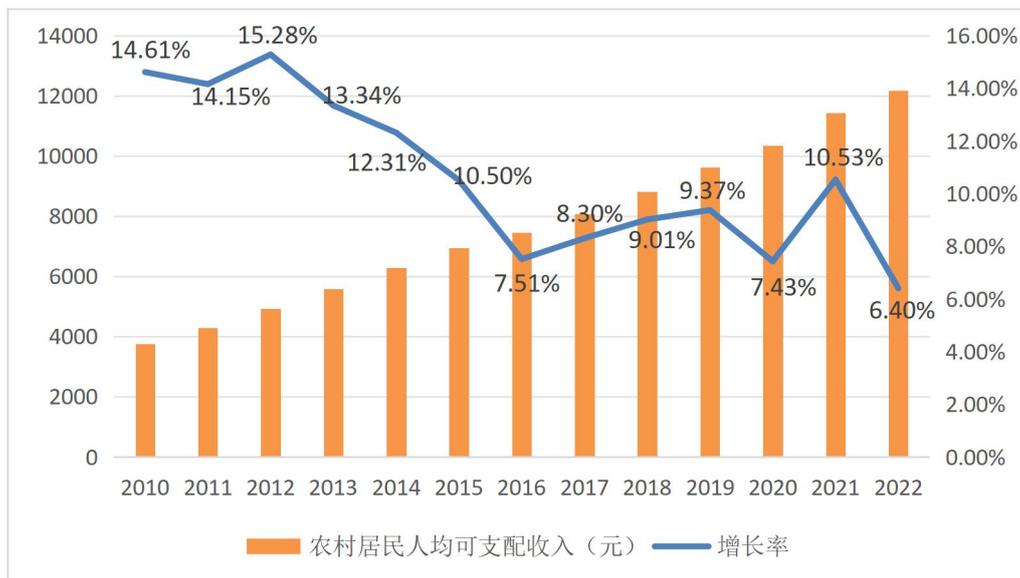


图 3.3 2010-2022 年来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2010-2022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由图 3.3 可知，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逐年增长，在 2010 年到

2022年这13年间，甘肃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超过3.5倍，由2010年的3747元增加到2022年的12165元。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处于稳步上升阶段，在2012年增长率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从2013年开始，增速开始逐步放缓，到2016年，虽然这四年甘肃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一直在降低，但其平均增速还是超过了10%。2016年之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又开始缓慢上升，中间过程虽有波折，但整体还是稳定在8%的增长速度。

3.2.2 各类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同

表 3.2 甘肃省历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结构（元）

年份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0	1312	2031	45	360	3747
2011	1709	2043	90	436	4278
2012	1956	2314	123	538	4931
2013	2411	2441	145	591	5589
2014	2719	2688	182	688	6277
2015	1975	3025	128	1808	6936
2016	2125	3261	128	1942	7457
2017	2275	3556	142	2102	8076
2018	2535	3824	212	2234	8804
2019	2769	4322	130	2408	9629
2020	2986	4650	135	2573	10344
2021	3337	5124	150	2822	11433
2022	3498	5435	161	3071	12165

数据来源：2010-2022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本文基于甘肃省2010年至2022年近13年的数据，对农村居民的各类收入进行了探究。从表3.2的数据可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是甘肃省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两者在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相对而言，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在整体收入结构中的占比则显得较低。通过图3.2的趋势分析可以进一步确认，近13年来，在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两者的占比始终保持在70%以上。其中经营净收入已经逐渐超越工资性收入，成为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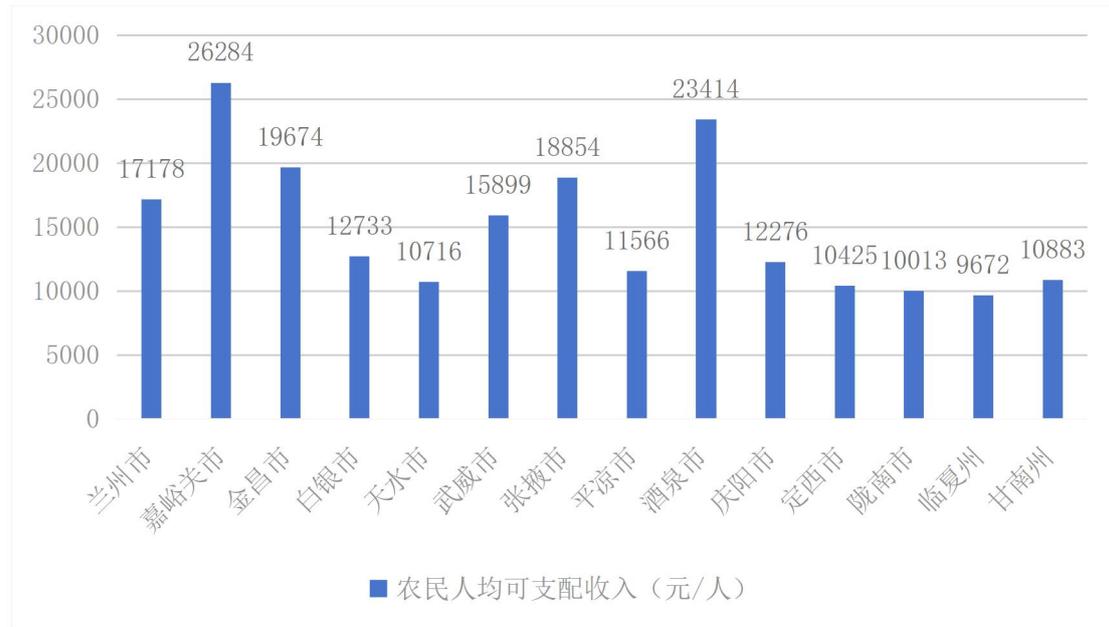


图 3.4 2022 年甘肃省各市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2022 年甘肃省各市州统计公报

由图 3.4 可知，2022 年甘肃省各市州之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异。其中酒泉、嘉峪关和金昌等地由于自身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与其他地市相比经济发展程度整体更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该地市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相对较高；而定西、庆阳等市州由于受自身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工业发展程度的影响，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相对较低。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部分市州由于过度依赖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无法有效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各市州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图 3.5 2010 年-2022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各项收入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2010-2022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根据图 3.5 所揭示的信息，甘肃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整体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确实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中的重要地位，也从侧面证明了甘肃省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民就业机会的日益增多。随着甘肃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民能够接触到更多样化的工作机会，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这种趋势对于提升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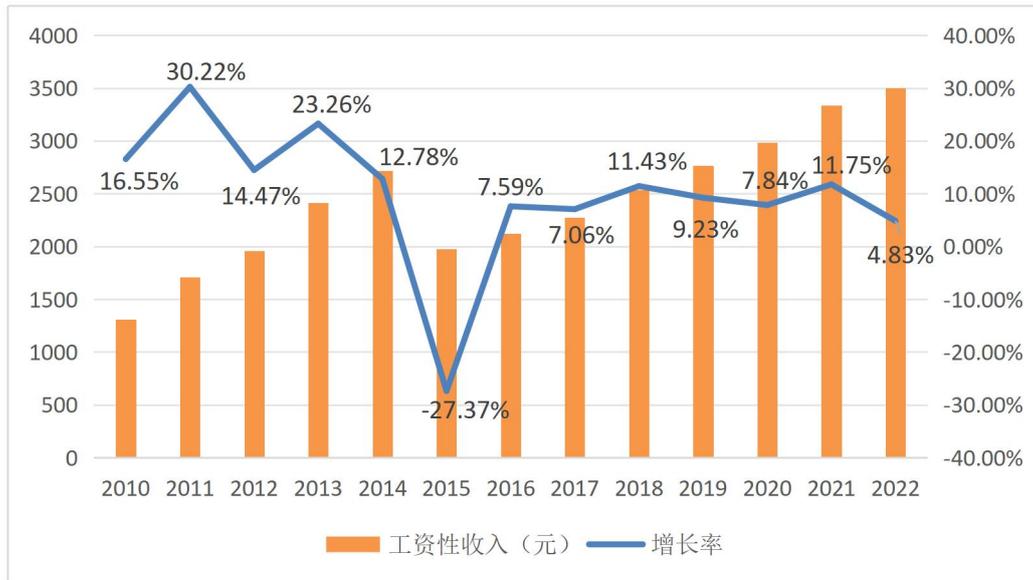


图 3.6 2010-2022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及增长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2010-2022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图 3.6 显示了 2010 年至 2022 年间甘肃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情况，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整体呈上升态势，从 2010 年的 1312 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3498 元，绝对数额增长了 2.6 倍。在 2011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达到了 30.22%，2011 年后增速开始下降且波动较大，至 2014 年，增速已降至 12.78%。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和政府为了应对其带来的冲击，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得到了提高，其增速在这一时期虽然整体上在不断放缓，但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平均增速仍高于 10%。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逐渐恢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 2016 年开始，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率逐渐趋于平稳。在 2016 年至 2022 年期间，年平均增速基本稳定在 8.5% 附近，这表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一时期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不仅受益于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就业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



图 3.7 2010-2022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及增长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2010-2022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图 3.7 揭示了 2010 年至 2022 年间甘肃省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的动态变化。从整体趋势来看，经营净收入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增长率则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具体到各个年份，2012 年成为了增速的峰值，增长率高达 13.27%，而 2019 年则是增长量的一个显著高点，经营净收入同比增加了 498 元。与这一整体增长趋势形成对比的是，2011 年的增速明显放缓，成为这 13 年中的最低点，增长率仅为 0.57%，经营净收入的同比增加额也不足 12 元。农村居民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一般是农业生产，但随着甘肃省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也日趋多样化。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耕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从而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逐渐流入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这一转变也导致了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由于甘肃省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条件，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相对有限。因此，第一产业在甘肃省经济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结构特点决定了，尽管经营净收入的比重在逐渐下降，同时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在逐渐上升，但经营净收入依然是甘肃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甘肃省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近年来实现了显著增长，从 2010 年的 2031 元上升至 2022 年的 5435 元，增长了近 2.7 倍，与工资性收入相比，这一增长规模略胜一筹，充分展现了经营净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重要地位。从图 3.7 可以清

晰地看出，经营净收入一直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甘肃省农村居民在经营活动中的积极努力和成效，更是国家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的生动体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了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保障“三农”工作稳步进行的重要性。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努力提高农民收入。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为甘肃省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递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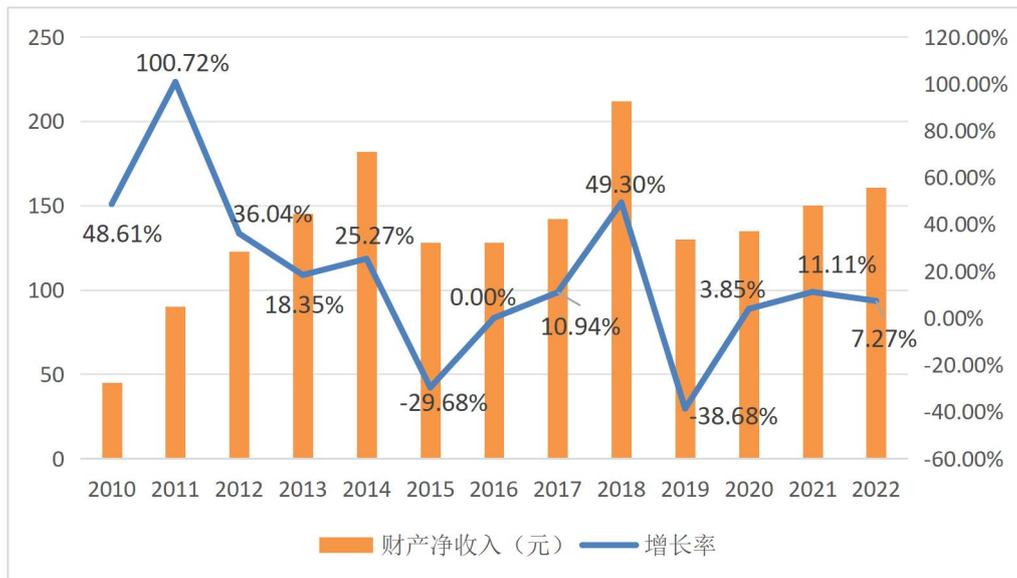


图 3.8 2010-2022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及增长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2010-2022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图 3.8 显示了 2010 年至 2022 年间甘肃省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的情况，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的增长率不稳定且波动较大，但整体来看财产净收入还是处于上升趋势，从 2010 年的 45 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161 元，增长了近 3.6 倍。与其他三种收入相比，在甘肃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财产净收入的所占比重最少。这主要是由于农民所拥有的实物财产，如土地和房屋，尚未得到充分的市场开发利用，从而难以转化为有效的财产性收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农民的资产具有巨大的增值潜力。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政策和市场手段，推动农村土地和房屋的市场化开发利用，那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望得到显著提升。

我国农村居民的财产主要集中在自有房产和储蓄存款两方面,这种相对单一的财产结构限制了他们通过多元化投资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与之相比,发达国家的农村居民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拥有更广泛的财产分布,这得益于他们较高的金融素养和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在我国,农村居民普遍缺乏相关金融知识,金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较为严重,这制约了他们参与金融市场并从中获益的能力。为了提升农民的财产净收入,政府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一方面,加强农村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金融市场的机遇与风险。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减少金融信息不对称,为农民提供更加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财产净收入的增加不仅具有较大的增值空间,可以为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还有助于缓解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所承担的风险。通过多元化投资,农民可以将风险分散到不同的资产类别中,降低因单一资产波动带来的损失。因此,提升农民财产净收入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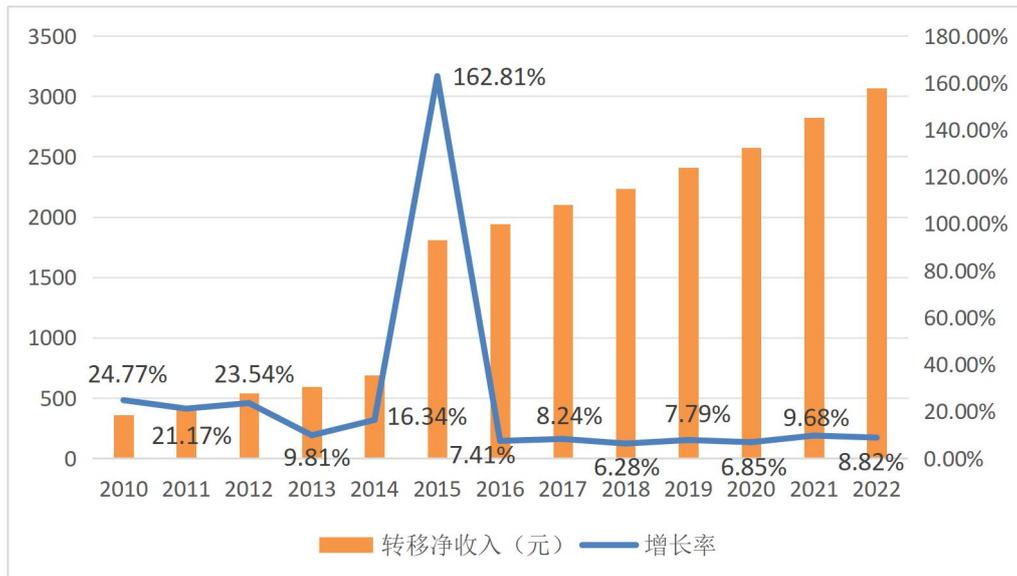


图 3.9 2010-2022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及增长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2010-2022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图 3.9 显示了 2010 年至 2022 年间甘肃省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的情况,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居民的转移净收入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除了个别年份外,其增长率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这表明政府为了缓解城乡

收入差距，加强了对农村居民转移收入的支持。尽管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转移净收入所占的比重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相比较小，但其增长速度却显著高于后两者，从2010年360元增加到2022年的3017元，13年间增长了8.4倍。

4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评价指数测度

4.1 小额信贷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

4.1.1 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农户小额信贷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当前研究在探讨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时,多数学者倾向于通过定量方式,聚焦于农户所获得的小额信贷数额这单一维度进行分析,对于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体系的综合性研究却相对匮乏。本文认为,农户小额贷款作为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概念,其发展水平不应仅由单一指标来衡量,单纯依据小额信贷数额这一指标,难以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小额信贷发展的真实状况。所以本文参考以下学者对指标评价体系构建的相关研究,构建甘肃省小额信贷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周孟亮(2011)提出的我国小额信贷社会绩效评价指标是一个综合评估体系,旨在全面、客观地衡量小额信贷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和成效,该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服务深度、社会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状况等方面。徐光华等(2007)提出将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三个方面纳入战略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中。杨军等(2016)对江苏52个县域构建的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围绕金融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进行了整体评价分析。张超群(2022)在构建普惠金融评估指标体系时,提出了从覆盖面、可得性、满意度和经济效应四个主要维度来进行分析。

为了更全面、准确地评估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本文在借鉴上述专家学者对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和小额信贷社会绩效评价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小额信贷服务的普及性、效用性和质量性三个核心维度出发,构建甘肃省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如表4.1所示,对相关指标做了解释说明。

表 4.1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指标属性
农户小额信贷的普及性	农信社网点地理密度	农信社网点数量/区域面积	正
	农信社金融服务网点密度	农信社网点数量/农村人口数量	正
	农信社从业人员地理密度	农信社从业人员数量/区域面积	正
	农信社金融服务人员密度	农信社从业人员数量/农村人口数量	正
农户小额信贷的效用性	农村居民人均贷款水平	农信社年末贷款余额/年末农村人口数量	正
	农村居民人均存款水平	农信社年末存款余额/年末农村人口数量	正
	农信社贷款情况	农信社人均贷款余额/人均 GDP	正
农户小额信贷的质量性	农信社存款情况	农信社人均存款余额/人均 GDP	正
	地区保险密度	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地区年末人口总数	正
	农信社存贷比	农信社贷款余额/存款余额	负
	农信社涉农贷款占比	农信社涉农贷款余额/贷款总额	正

农户小额信贷服务的普及性，是衡量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我们通过农信社网点数以及从业人员数这两个关键指标，来代表小额信贷的金融覆盖率。农村金融市场面临着融资需求分散、风险高、收益低等多重挑战，这导致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在拓展业务时面临困难。但随着金融机构覆盖率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低收入人群得以享受到正规的金融服务，从而避免了他们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因此，普及性不仅直观反映了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广泛渗透和深入发展。

农户小额信贷服务的效用性，具体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上。效用性评估的核心在于金融机构存贷款服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通过考察信用社人均存贷款额以及存贷款的整体状况等关键指标，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小额信贷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而评估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这些指标不仅反映了金

融机构的服务能力，也揭示了小额信贷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农户小额信贷服务的质量性，它实质上反映了金融机构在资金运用方面的效能。存贷比一旦上升，便可能引发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外流；而部分农民在按时偿还贷款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这也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稳健运营。农业保险为农民在生产经营中分散了风险，确保了他们的家庭经营收入，并间接提升了农民按时还款的可靠性。因此，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关键，只有保持高质量的信贷往来，才能推动双方共同进步。

4.1.2 测度方法

测算指标权重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其中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且科学的权重赋值方法，因其依据数据本身的信息量来确定权重，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这种方法不仅操作简便，而且能有效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确保权重确定的准确性。因此，在测算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时，我们选择熵值法作为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要方法。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第1步：在处理具有不同单位和量纲的指标数据时，为了消除量纲和单位的影响，使得不同指标之间可以进行直接比较和计算，通常会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做可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避免因单位不统一而引入的偏差。本研究采取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X_{ij} 为各指标原始数值，且 $i=1, 2, \dots, m$ （ m 表示年份）、 $j=1, 2, \dots, n$ （ n 表示指标数量），其中 $\min(X_j)$ 和 $\max(X_j)$ 分别代表第 j 个指标值的最小值与最大值。

当指标属性为正时，其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X'_{ij} = \frac{X_{ij} - \min(X_j)}{\max(X_j) - \min(X_j)} \quad (4.1)$$

当指标属性为负时，其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X'_{ij} = \frac{\max(X_j) - X_{ij}}{\max(X_j) - \min(X_j)} \quad (4.2)$$

第2步：数据的归一化处理。在对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作标准化处理后，处

理后的数据可能会出现一些较小的值或负值，为了后续计算方便统一，我们通过将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对其进行平移处理，从而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

$$X''_{ij} = H + X'_{ij} \quad (4.3)$$

其中 H 作为常数是指对指标平移的幅度，一般被设定为 1。

第 3 步：采用比重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Y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quad (4.4)$$

第 4 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_j = -\frac{1}{\ln m} \sum_{i=1}^m Y_{ij} \ln Y_{ij} \quad (4.5)$$

第 5 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G_j = 1 - E_j \quad (4.6)$$

第 6 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omega_j = \frac{G_j}{\sum_{j=1}^n G_j} \quad (4.7)$$

4.2 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测度

4.2.1 数据处理与指标计算

为更全面客观地反映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状况，本文通过借鉴普惠金融发展评价体系，考虑甘肃省的实际发展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2013 年至 2022 年甘肃省 14 个市州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经过测算和数据处理，得出了甘肃省 14 个市州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在数据来源方面，我们主要采用了统计数据，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各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金融年鉴》、《甘肃发展年鉴》、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权威渠道，部分指标如地区保险密度是利用相关公式计算原始数据得来的，个别缺失数据则是借鉴以往文

献的做法通过插值法估算得出。

表 4.2 甘肃省各市州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相关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维度	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权重
农户小额 信贷的普 及性	农信社网点地理密度	0.0098	0.0082	0.0008	0.0388	0.0954
	农信社金融服务网点密度	3.6409	4.9894	0.8449	27.1240	0.0898
	农信社从业人员地理密度	0.0941	0.1280	0.0062	0.6645	0.0918
	农信社金融服务人员密度	38.2057	63.2087	4.4167	340.5436	0.0919
农户小额 信贷的效 用性	农村居民人均贷款水平	6.9564	14.5431	0.3170	63.2673	0.0876
	农村居民人均存款水平	7.1811	12.7068	0.4777	63.3510	0.0913
	农信社贷款情况	1.1067	1.6218	0.1558	9.6959	0.0894
	农信社存款情况	1.2673	1.2988	0.2732	6.7317	0.0891
农户小额 信贷的质 量性	地区保险密度	0.1689	0.1113	0.0224	0.4395	0.0883
	农信社存贷比	0.7166	0.2075	0.3626	1.4892	0.0924
	农信社涉农贷款占比	0.7501	0.0906	0.6258	0.8733	0.0930

4.2.2 结果分析

本章利用熵值法经过对所得相关指标数据计算得到了各项指标所占的权重，从上表 4.2 中得到的权重的结果可以看出，各项指标所占权重相对较为平均，均在 0.09 左右。由于各维度所包含指标数量并不统一，因此我们取维度内各指标所占权重的平均值，以此为基础来衡量三个维度的所占权重情况。

农户小额信贷服务的普及性所占权重在三个维度中最高，维度内各指标所占权重的平均值为 0.0922，从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来看，甘肃省农信社网点地理密度的平均值为 0.0098，这意味着在平均每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分布着 98 个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农信社金融服务网点密度的平均值为 3.6409，即平均每万人就有约 3.64 个农信社网点；农信社从业人员地理密度的平均值为 0.0941，说明在平均每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 941 名农信社从业人员；农信社金融服务人员密度的平均值为 38.2057，即平均每万人中有近 38 名农信社从业

人员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服务范围较广，农信社金融服务网点密度较大，农村金融从业人员众多，这些都表明农户小额信贷在甘肃省农村地区已经具有一定的普及度，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农户小额信贷服务的质量性所占权重次之，维度内各指标所占权重的平均值为 0.0913，这说明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服务发展的质量比较高，其中“农信社存贷比”和“农信社涉农贷款占比”这两个指标所占权重分别为 0.0924、0.0930，在 11 个指标中所占权重均位列前三，根据表 4.2 中数据显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存贷比的平均值与最大值分别达到了 71.66%和 148.92%，其涉农贷款占比的平均值和最大值也达到了 75.01%和 87.33%，再结合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绝大部分贷款都是向农业领域发放的，这也说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是支持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的绝对主力军。而地区保险密度这一指标所占权重虽只有 0.0883，但从具体数据看，“地区保险密度”这一指标的平均值和最大值为 0.1689 和 0.4395，这表明甘肃省的相关农业保险确实分散了农村居民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部分风险，在确保农村居民获得相应收入的同时，也为农村居民如期归还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提供了保证，从而促进了农村信用社可持续经营与发展，为后续更高质量的信贷往来打下基础。

农户小额信贷服务的效用性这一维度所占权重最低，维度内各指标所占权重的平均值为 0.0893，从表 4.2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一维度的四个指标所占权重是三个维度中分布最均匀的。从具体数据看，“农村居民人均贷款水平”和“农村居民人均存款水平”的最大值分别为 63.2673、63.7510，这可能是随着甘肃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除传统的储蓄意愿之外，贷款意愿也在逐步提高，同时随着农信社在农村地区营业网点的不断增加，吸收农村闲散资金的效率也在不断提升。

表 4.3 2013-2022 年甘肃省各市州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兰州	0.2267	0.2819	0.4780	0.6139	0.5498	0.6009	0.4584	0.5712	0.6232	0.6416
嘉峪关	0.2659	0.5233	0.4866	0.6724	0.5070	0.4823	0.3974	0.3801	0.3112	0.3025
金昌	0.3334	0.3441	0.3922	0.4828	0.4790	0.5060	0.5519	0.4963	0.5134	0.5230
白银	0.4833	0.4908	0.4690	0.5592	0.5304	0.5618	0.4403	0.4859	0.5270	0.5221
天水	0.3895	0.3890	0.3134	0.4269	0.4399	0.5738	0.5000	0.5578	0.5754	0.5163
武威	0.1880	0.4048	0.4563	0.5077	0.5425	0.6158	0.7268	0.6502	0.6514	0.6736

续表 4.3 2013-2022 年甘肃省各市州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张掖	0.2923	0.3005	0.4812	0.5195	0.5726	0.6191	0.6961	0.7374	0.7085	0.7352
平凉	0.2112	0.2554	0.3662	0.4312	0.5832	0.6236	0.6676	0.7107	0.7137	0.6089
酒泉	0.3717	0.4167	0.3628	0.4701	0.6893	0.6240	0.6400	0.5383	0.4758	0.4855
庆阳	0.3401	0.3726	0.3797	0.4596	0.4492	0.5492	0.5418	0.5674	0.6406	0.6465
定西	0.3771	0.4046	0.3431	0.4465	0.4567	0.5527	0.6000	0.5062	0.4650	0.4550
陇南	0.2341	0.3214	0.4332	0.5072	0.5988	0.7394	0.6375	0.5382	0.6162	0.6935
临夏	0.3832	0.3584	0.3859	0.4562	0.4022	0.4693	0.4587	0.5003	0.5910	0.6353
甘南	0.4620	0.4826	0.4475	0.5366	0.5532	0.6204	0.4894	0.3614	0.4601	0.4335

表 4.3 详细展示了甘肃省 14 个市州在 2013 年至 2022 年这十年间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根据表格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明显受到地域和经济水平的双重影响。以张掖市为例，2013 年其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为 0.2923，在全省范围内排名第九。然而到了 2022 年，张掖市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达到了 0.7352，跃居全省首位。与同年嘉峪关市的 0.3025 相比，张掖市的水平高出近 2.5 倍。这一显著变化不仅突显了张掖市在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方面的积极进步，也反映了甘肃省内不同市州在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上存在的明显差异。

表 4.4 甘肃省各市州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1	嘉峪关 0.5233	嘉峪关 0.6724	陇南 0.7394	张掖 0.7374	张掖 0.7352
2	白银 0.4908	兰州 0.6139	酒泉 0.6240	平凉 0.7107	陇南 0.6935
3	甘南 0.4826	白银 0.5592	平凉 0.6236	武威 0.6502	武威 0.6736
4	酒泉 0.4167	甘南 0.5366	甘南 0.6204	兰州 0.5712	庆阳 0.6465
5	武威 0.4048	张掖 0.5195	张掖 0.6191	庆阳 0.5674	兰州 0.6416
6	定西 0.4046	武威 0.5077	武威 0.6158	天水 0.5578	临夏 0.6353
7	天水 0.3890	陇南 0.5072	兰州 0.6009	酒泉 0.5383	平凉 0.6089
8	庆阳 0.3726	金昌 0.4828	天水 0.5738	陇南 0.5382	金昌 0.5230
9	临夏 0.3584	酒泉 0.4701	白银 0.5618	定西 0.5062	白银 0.5221
10	金昌 0.3441	庆阳 0.4596	定西 0.5527	临夏 0.5003	天水 0.5163
11	陇南 0.3214	临夏 0.4562	庆阳 0.5492	金昌 0.4963	酒泉 0.4855
12	张掖 0.3005	定西 0.4465	金昌 0.5060	白银 0.4859	定西 0.4550
13	兰州 0.2819	平凉 0.4312	嘉峪关 0.4823	嘉峪关 0.3801	甘南 0.4335
14	平凉 0.2554	天水 0.4269	临夏 0.4693	甘南 0.3614	嘉峪关 0.3025

本文选取了其中 5 年甘肃省各市州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对其按年份进行排名,从表 4.4 中可以看出,从 2014 年到 2022 年,虽然甘肃省 14 个市州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的增长幅度不尽相同,但整体上都有所提高,这一趋势也符合下图 4.1 中所示的从甘肃省省级数据入手得到的测度结果。



图 4.1 2013-2022 年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

图 4.1 反映了 2013-2022 年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总体上是在逐年递增的,2013 年甘肃省农户小额发展水平仅有 0.4852,到 2022 年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已达 0.8121。其中 2016 年的增长率最高,达到了 16.06%,2019 年的增长率最低,为-2.38%,是 10 年间唯一的一次负增长,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全国突发卫生事件的影响,更多的资源被用在医疗领域,从而减少了其他领域的资金投入。

5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前文已经对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以及农村居民收入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本章将借助多元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影响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多种因素。在此过程中，重点研究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5.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5.1.1 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I) 是一个综合反映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从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来看，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工资性收入 (WI)、经营净收入 (MI)、财产净收入 (PI) 和转移净收入 (TI)，这四部分收入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来源，共同构成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内容。其中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三部分之和又可以称为非农收入 (NFI)。

(2) 核心解释变量

大部分采用定量研究的学者只采用农户小额信贷的具体数额来衡量一个地区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但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概念，用农户小额信贷数额这单一指标难以代表当地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在参考借鉴以往研究学者对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以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衡量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用 CREDIT 来表示。

(3) 控制变量

本文虽然主要研究的是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但是众所周知，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有很多，不是仅仅只有农户小额信贷这一种因素，因此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实际发

展情况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在分析时除了考虑农户小额信贷这一因素，还考虑到了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PCA）。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为当年耕地面积总数与当年末农村人口总数的比值。人均耕地面积越大，意味着每个农村居民可以支配的土地资源越多，从而有可能通过提高农业产出、发展特色种植等方式增加收入。同时耕地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产，可以增加农村居民的信用评级，提高他们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较大的耕地面积通常意味着较强的还款能力，金融机构可能会为这些申请人提供更高的贷款额度，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农村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I）。农村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当年年末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当年年末农村人口总数。在农业生产或创业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购买机械设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还是扩建厂房，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农村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水平，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进而对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一般来说，固定资产投入越大，意味着生产能力和效率越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也就越有可能增加。

农村居民人均财政支农数额（FSA）。即当年财政支农总额与当年末农村人口数量的比值，其中财政支农总额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随着政府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增大，一系列惠农政策日渐成熟完善。这些政策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资金保障，还推动了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激发，农业生产效益得到了提升，进而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即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地区年末总人口数量。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农业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加需要坚实的经济后盾作为支撑。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能够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进而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地区城镇化水平（URB）。即地区城镇常住人口数量除以地区年末地区总人口数量。随着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种转变带来了诸多挑战，但同时也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化进程为农村居民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增收空间，推动了农村农业现代化

的进程，也带动了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的综合竞争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OPEN）。即当年地区进出口总值除以当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对外开放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对于农村居民来讲，一方面，销售农产品的渠道可能就越多，同时也更有机会引进更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经验，通过提高产销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水平越高，意味着更宽松的贸易政策和更完善的金融市场，这有助于农民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可以从事更多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增加收入来源。

表 5.1 指标变量及说明

指标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DI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数量
	WI	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农民工资性收入/农村人口数量
	MI	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农民经营净收入/农村人口数量
	PI	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农民财产净收入/农村人口数量
	TI	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农民转移净收入/农村人口数量
	NFI	农民人均非农收入	农民非农收入/农村人口数量
核心解释变量	CREDIT	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	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
	PCA	农民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农村人口数量
	FI	农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村人口数量
控制变量	FSA	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数额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农村人口数量
	GDP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人口总数
	URB	城镇化水平	地区城镇常住人口数/地区总人口数
	OPEN	对外开放水平	地区进出口总值/地区 GDP 总值

5.1.2 数据来源

为确保所用数据真实可靠,本文所使用原始数据绝大部分是通过查找甘肃省统计局官网公布的统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甘肃发展年鉴》、《甘肃金融年鉴》、各市州历年统计公报等,同时由于“耕地面积”这一指标因统计口径变更从2018年开始不再列示于《甘肃发展年鉴》,最终从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官网所公布的相关数据中整理得到。其中第四章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测度所用数据均是来自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官方公开数据,个别指标的个别缺失数据则是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5.2 模型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5.2.1 模型选取

查阅相关文献可知,对于短面板数据,学者们普遍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为了保证本文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在构建模型之前先进行模型选取。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需要利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来确定回归模型应该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所以对被解释变量的6种农民收入分别进行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5.2所示。从表5.2可以看出,豪斯曼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应该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在对甘肃省农户小额发展水平对6种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回归分析时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 5.2 豪斯曼检验结果

模型	P 值	结论
模型 1 (DI)	0.0000	固定效应
模型 2 (WI)	0.0000	固定效应
模型 3 (MI)	0.0000	固定效应
模型 4 (PI)	0.0475	固定效应
模型 5 (TI)	0.0359	固定效应
模型 6 (NFI)	0.0000	固定效应

5.2.2 模型构建

本章为分析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选取2013-2022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将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已有文献选取其余六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由前文可知，本文所构建模型应为固定效应模型，如下所示：

$$Y_{it} = \beta_0 + \beta_1 \cdot CREDIT_{it} + \beta_2 \cdot PCA_{it} + \beta_3 \cdot LNFI_{it} + \beta_4 \cdot LNFS_{it} + \beta_5 \cdot LNGDP_{it} + \beta_6 \cdot URB_{it} + \beta_7 \cdot OPEN_{it} + \mu_t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5-1)$$

其中 Y_{it} 表示农民人均收入， t 表示时间， i 表示地区， $CREDIT_{it}$ 表示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数， PCA_{it} 表示农民人均耕地面积， FI_{it} 表示农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FSA_{it} 表示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数额， GDP_{it} 表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URB_{it} 表示城镇化水平， $OPEN_{it}$ 表示对外开放水平， β_0 为常数项， β_1 、 β_2 、 β_3 、 β_4 、 β_5 、 β_6 、 β_7 分别是对应变量的系数， μ_t 表示时间效应， δ_i 表示个体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为了保持数据的平稳性，减少原始数据本身存在的波动，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5.2.3 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13-2022年甘肃省14个市州近10年的数据，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甘肃省各市州的实际情况及数据可得性，选取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数额、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6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5.3所示。

表 5.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	9.1686	0.4343	8.2275	10.1767

续表 5.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WI	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40	8.1213	0.5227	6.8271	9.4936
MI	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140	8.3447	0.5327	7.3849	9.5842
PI	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140	5.1994	0.8636	3.5835	7.3988
TI	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140	7.1631	0.6316	4.9053	8.2938
NFI	农民人均非农收入	140	8.5599	0.4059	7.6575	9.6007
CREDIT	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	140	0.4960	0.1219	0.1880	0.7394
PCA	农民人均耕地面积	140	0.4744	0.2142	0.1902	1.3215
FI	农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140	8.1052	1.2442	5.2484	11.5210
FSA	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数额	140	8.3831	0.5499	7.0369	9.6489
GDP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140	10.3126	0.6528	9.0407	11.6966
URB	城镇化水平	140	0.5051	0.1943	0.2412	0.9447
OPEN	对外开放水平	140	0.0604	0.1261	0.0006	0.9133

表 5.3 中数据显示,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在经过对数化处理后,标准差都小于 1,反映了数据的平稳性,为后续统计分析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5.3 变量检验与模型回归

5.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从而对回归分析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回归之前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首先利用相关系数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以此来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表 5.4 各变量相关系数

	DI	CREDIT	PCA	FI	FSA	GDP	URB	OPEN
DI	1.0000							
CREDIT	0.3905	1.0000						
PCA	0.5469	0.1415	1.0000					
FI	0.7188	0.1094	0.5516	1.0000				
FSA	0.7171	0.4347	0.3549	0.3333	1.0000			
GDP	0.8615	0.1261	0.5467	0.7225	0.5995	1.0000		
URB	0.7596	0.0538	0.4118	0.6617	0.5220	0.9026	1.0000	
OPEN	0.2061	-0.1367	0.6083	0.2068	0.1864	0.3973	0.4502	1.0000

如上所示,表 5.4 探讨了被解释变量中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I)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其余被解释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与之类似,因此不再赘述表格,从表 5.4 中可以发现,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大部分都是小于 0.5 的,但仍有个别数据高于 0.5,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因此还需要利用 VIF 检验来验证核心解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 5.5 各变量 VIF 值

	VIF	1/VIF
CREDIT	1.39	0.7194
PCA	3.13	0.3192
FI	2.90	0.3452
FSA	2.08	0.4809
GDP	8.51	0.1175
URB	7.43	0.1345
OPEN	2.51	0.3986

一般情况下，当变量的 VIF 值大于 10 时，说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 5.5 可知，各变量的 VIF 值都是小于 10 的。综上所述，本文所选指标除个别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之外，其他大部分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表明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强烈的线性相关性，各个变量的 VIF 值也均小于 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认定本文所选变量可以一同用于回归分析，不会因为多重共线性问题而扭曲回归结果。

5.3.2 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取了甘肃省 14 个市州 2013-2022 年 10 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避免因为数据本身的原因引起的伪回归问题，有必要利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本文所用面板数据属于短面板数据，因此本文将通过 HT 检验的方法检验各样本数据的平稳性。

表 5.6 平稳性检验结果

	Z	p-value	平稳性
DI	0.9748	0.8352	不平稳
D (DI)	-3.4339	0.0000	平稳
WI	-0.0529	0.4789	不平稳
D (WI)	-7.8477	0.0000	平稳
MI	-0.6324	0.2636	不平稳
D (MI)	-12.7332	0.0000	平稳
PI	-1.4056	0.0799	不平稳
D (PI)	-13.8230	0.0000	平稳
TI	0.1744	0.5692	不平稳
D (TI)	-7.5284	0.0000	平稳
NFI	-0.7699	0.2207	不平稳
D (NFI)	-10.7525	0.0000	平稳
CREDIT	-1.5502	0.0605	不平稳

续表 5.6 平稳性检验结果

	Z	p-value	平稳性
D (CREDIT)	-11.0513	0.0000	平稳
PCA	3.3569	0.9996	不平稳
D (PCA)	-9.2065	0.0000	平稳
FI	-5.6084	0.0000	平稳
FSA	-0.9811	0.1633	不平稳
D (FSA)	-8.6453	0.0000	平稳
GDP	-1.6731	0.0472	不平稳
D (GDP)	-7.0979	0.0000	平稳
URB	2.9600	0.9985	不平稳
D (URB)	-5.8865	0.0000	平稳
OPEN	-7.7230	0.0000	平稳

一般来说, 平稳性检验的 p 值在小于 0.01 时才可以拒绝原假设, 表明数据是平稳的。从表 5.6 中可以看出, FI 和 OPEN 两个变量的 p 值是 0, 说明这两个变量是平稳的, 但除此之外的其余变量 p 值都是大于 0.01 的, 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差分处理。如表 5.6 所示, 可以看出在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之后, 所有变量的 p 值均小于 0.01, 由此说明除 FI 和 OPEN 之外的其余变量在经过一阶差分处理之后是平稳的。

由上文可知, 本文所用面板数据的大部分变量都是一阶差分之后变得平稳, 但如果使用一阶差分后的数据用于回归可能无法直接反映原始数据的经济学含义, 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具有经济学意义, 本文希望可以使用差分之前的数据进行回归, 因此还有必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表 5.7 协整检验结果

	Statistic	p-value
模型 1 (DI)	4.0816	0.0000
模型 2 (WI)	4.0866	0.0000

续表 5.7 协整检验结果

	Statistic	p-value
模型 3 (MI)	4.0866	0.0000
模型 4 (PI)	12.2268	0.0000
模型 5 (TI)	4.0866	0.0000
模型 6 (NFI)	4.0866	0.0000

协整检验是一种用于分析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相关性的统计方法，主要用于确定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协整检验，我们可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果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那么可以直接使用原始数据进行回归，而无需先进行差分处理。如表 5.7 所示，本文采用 westerlund 检验的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发现 6 个模型的检验结果 p 值均为 0，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可以使用差分之前的数据进行回归。

5.3.3 模型回归与分析

完成所需模型的构建和各个变量的相关检验之后，本文以甘肃省 14 个市州 2013-2022 年这 10 年的数据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表 5.8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I	WI	MI	PI	TI	NFI
CREDIT	1.391*** (0.279)	1.466*** (0.343)	1.234*** (0.357)	0.415 (0.602)	2.218*** (0.398)	1.462*** (0.255)
_cons	8.479*** (0.143)	7.394*** (0.175)	7.733*** (0.182)	4.994*** (0.307)	6.063*** (0.203)	7.835*** (0.130)
N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r2	0.152	0.117	0.080	0.003	0.183	0.193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 t 值，***、**、*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首先对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 (CREDIT) 和六个被解释变量在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前提下进行基准回归, 通过表 5.8 基准回归结果可知, 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 (CREDIT) 对除了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PI) 不显著之外, 对剩余的五个被解释变量都在 1% 的水平下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且系数都大于 1, 这表示当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时, 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将会超过一个单位。模型 (4) 的系数为 0.415, 说明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 (CREDIT) 与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PI) 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尽管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根据表 5.8 的回归结果, 可以认为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的提升, 能够有力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表 5.9 全样本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I	WI	MI	PI	TI	NFI
CREDIT	0.567*** (0.124)	0.625*** (0.157)	0.026 (0.175)	-0.189 (0.451)	2.745*** (0.378)	0.951*** (0.150)
PCA	0.354** (0.106)	0.115 (0.134)	0.799*** (0.149)	0.379 (0.385)	0.363 (0.323)	0.038 (0.128)
FI	0.053** (0.018)	-0.009 (0.022)	0.144*** (0.025)	0.120 (0.064)	-0.220*** (0.053)	-0.031 (0.021)
FSA	0.181*** (0.034)	0.200*** (0.043)	0.276*** (0.047)	0.170 (0.122)	-0.250* (0.103)	0.118** (0.041)
GDP	0.298*** (0.057)	0.336*** (0.073)	0.303*** (0.081)	0.249 (0.208)	0.377* (0.175)	0.233*** (0.069)
URB	0.320 (0.180)	1.106*** (0.228)	-0.251 (0.254)	1.023 (0.654)	-1.559** (0.548)	0.943*** (0.217)
OPEN	-0.671*** (0.161)	-0.772*** (0.204)	-0.876*** (0.227)	1.509* (0.586)	0.020 (0.491)	-0.480* (0.194)
_cons	3.582*** (0.474)	2.183*** (0.600)	1.523* (0.668)	-0.459 (1.720)	6.408*** (1.443)	4.487*** (0.571)
N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r2	0.885	0.872	0.848	0.616	0.494	0.808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 t 值, ***, **, *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后, 通过增加控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上表 5.9 所示。在增加控制变量之后可以发现, 除回归结果 (4) (5) 的 r2 分别是

0.494、0.616 之外，其余回归结果的 r^2 都是大于 0.8 的，说明回归结果的拟合程度较好。

在模型（1）中，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CREDIT）对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I）在 1% 的水平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为 0.567，说明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增加 0.567 个单位，因此可以认为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能够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模型（2）中，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CREDIT）与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WI）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 0.625，这说明当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提升一个单位时，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有望增加 0.625 个单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的就业机会日益增多，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工资性收入渠道。农民通过进城务工、从事服务业等方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提升了自身的还款能力和信用水平。由于农民的资金保障增强，金融机构更愿意向他们发放贷款，支持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农民在获得资金后，也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去拓宽收入来源，这样的良性循环不仅促进了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模型（3）中，回归系数为 0.026，说明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CREDIT）与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MI）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在模型（4）中，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CREDIT）与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PI）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经营性收入是指农民通过经营自有资产如种植养殖等获得的收入，而财产性收入是指农民出租自有土地房屋和机器设备等获得的收入，农户小额信贷会带给农村居民一定程度上的债务负担，而且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较大，农民如果无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就会有因债务负担过重从而限制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甚至会起到反向作用。

在模型（5）中，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CREDIT）与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TI）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回归系数为 2.745，说明效果非常显著。转移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种社会福利和农业补贴，结合当前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国家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性支付在不断增加，农村地区的信贷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农民在获得资金方面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购买农业生产

所需的物资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投资于农村新兴产业或创业项目,增加收入来源。这种正向激励进一步推动了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控制变量中,农民人均耕地面积(PCA)与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MI)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I)两个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系数分别为0.799和0.354,表明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将会增加0.799个单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会增加0.354个单位。农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I)与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MI)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I)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也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农民最主要的资产是土地和房屋,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农民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经营性收入,进而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由此可以认为,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数额(FSA)整体上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随着地方财政对农村地区补贴的增多,农民在获取资金、改善技术、扩大生产等方面的成本降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贷款的意愿,改善了农村金融环境,间接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存在着正向促进作用,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民增加资金需求创造了条件,导致农户小额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市场需求增加,同时拓展了农民获取收入的渠道,从而推动农民增收。

城镇化水平(URB)与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WI)之间的回归系数为1.10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推动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这是因为随着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也在随之上升。城镇化水平(URB)与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MI)的回归系数为-0.251,尽管不显著,但也可以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使得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农民有了更多获取收入的渠道,相比之下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经济效益不高,农民更愿意选择进入城市从事其他行业来获取报酬,从而导致农民的经营性收入降低。

对外开放水平（OPEN）与大部分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民自身的生产效率不高，甘肃省地处西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市场的竞争就会更激烈，受到的外部冲击也会越大，很可能就会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5.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了改变样本容量的方法来进行验证。我们剔除了样本中受到重大事件影响的个别年份样本，以排除这些特殊因素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干扰。随后，我们使用调整后的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如果回归结果仍然与改变样本容量之前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就说明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考虑到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在疫情期间金融机构的资金被更多地投向医疗及其他民生领域，从而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相对有所下降，进而可能会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造成影响，因此为了排除回归结果受重大事件的影响，本文剔除了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的数据，将剩下的2013-2019年及2022年的样本数据重新进行检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5.10所示。

表 5.10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I	WI	MI	PI	TI	NFI
CREDIT	0.563*** (0.151)	0.730*** (0.193)	-0.017 (0.216)	-0.299 (0.541)	2.505*** (0.455)	0.996*** (0.178)
PCA	0.409** (0.130)	0.077 (0.165)	0.948*** (0.185)	0.589 (0.464)	0.304 (0.390)	0.010 (0.153)
FI	0.052* (0.020)	-0.010 (0.026)	0.130*** (0.029)	0.106 (0.072)	-0.189** (0.061)	-0.024 (0.024)
FSA	0.168*** (0.040)	0.181*** (0.051)	0.271*** (0.057)	0.219 (0.142)	-0.260* (0.119)	0.096* (0.047)
GDP	0.299*** (0.064)	0.348*** (0.081)	0.307** (0.091)	0.245 (0.228)	0.329 (0.192)	0.232** (0.075)
URB	0.252 (0.201)	0.954*** (0.256)	-0.242 (0.287)	0.864 (0.719)	-1.481* (0.605)	0.829*** (0.237)
OPEN	-0.596** (0.177)	-0.594** (0.225)	-0.864*** (0.252)	1.335* (0.632)	0.073 (0.531)	-0.348 (0.208)
_cons	3.667***	2.230**	1.589*	-0.673	6.793***	4.633***

续表 5.10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I	WI	MI	PI	TI	NFI
	(0.530)	(0.675)	(0.757)	(1.896)	(1.595)	(0.625)
N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r ²	0.877	0.862	0.833	0.601	0.425	0.801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 t 值，***、**、*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 5.10 可知，在剔除受重大事件影响的样本数据之后，其余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与改变样本容量之前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各个模型的拟合程度也基本类似：除模型（4）（5）的 r² 分别为 0.601 和 0.425 之外，其余模型的 r² 都大于 0.8，说明样本的拟合程度较好。从显著性角度来看，在模型（1）（2）（5）（6）中，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CREDIT）对各被解释变量都在 1%的水平下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模型（3）（4）中都不显著，这与改变样本容量之前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5.3.5 异质性分析

根据前文的回归结果可知，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且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当地整体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而导致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将按照经济的发展水平来分类，以 2022 年甘肃省各市州的 GDP 总量排名为标准，将甘肃省 14 个市州分为两组，一组为 2022 年地区 GDP 总量排名前七名的城市，分别是兰州市、庆阳市、酒泉市、天水市、武威市、平凉市、白银市，这一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另一组为 2022 年地区 GDP 总量排名后七名的城市，分别是张掖市、陇南市、定西市、金昌市、临夏州、嘉峪关市、甘南州，这一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具体分类回归结果如下：

表 5.11 甘肃省经济发达地市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I	WI	MI	PI	TI	NFI
CREDIT	0.114* (0.156)	0.332* (0.227)	-0.236 (0.289)	-0.040 (0.540)	0.795* (0.378)	0.492* (0.240)
PCA	-0.022 (0.144)	0.542* (0.208)	0.745** (0.266)	-1.272* (0.497)	-2.179*** (0.347)	-0.467* (0.220)
FI	0.077*** (0.019)	-0.051 (0.028)	0.171*** (0.035)	0.008 (0.068)	-0.031 (0.046)	-0.035 (0.029)
FSA	0.447*** (0.056)	0.277** (0.082)	0.443*** (0.104)	0.387 (0.194)	0.643*** (0.136)	0.411*** (0.086)
GDP	0.172* (0.075)	-0.171 (0.108)	0.279* (0.138)	1.198*** (0.261)	0.325 (0.181)	0.030 (0.115)
URB	0.364 (0.262)	2.412*** (0.380)	-0.204 (0.485)	-2.217* (0.914)	-1.495* (0.634)	0.969* (0.402)
OPEN	-1.540** (0.487)	-2.304** (0.706)	-2.282* (0.900)	-1.103 (1.700)	1.115 (1.177)	-0.876 (0.747)
_cons	2.891*** (0.758)	6.467*** (1.098)	0.339 (1.400)	-8.984** (2.642)	0.313 (1.831)	4.667*** (1.162)
N	70	70	70	70	70	70
r2	0.931	0.877	0.877	0.579	0.669	0.803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 t 值，***、**、*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 5.11 可以看出，在对甘肃省经济发达地市的样本进行回归时，其拟合程度要比全样本回归的拟合程度更好，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对各个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的结果相似：在模型（1）（2）（5）（6）中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仅仅是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从显著性的角度来说不如全样本回归的结果显著；在模型（3）（4）中显示不显著。从回归系数来看，回归系数也要比全样本回归结果的系数更小。

表 5.12 甘肃省经济欠发达地市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I	WI1	MI	PI	TI	NFI
CREDIT	0.731*** (0.180)	0.957*** (0.196)	0.259 (0.226)	0.415 (0.314)	1.816*** (0.402)	1.033*** (0.189)

续表 5.12 甘肃省经济欠发达地市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I	WI1	MI	PI	TI	NFI
PCA	0.449** (0.139)	-0.096 (0.150)	0.658*** (0.174)	1.354*** (0.241)	1.621*** (0.309)	0.283 (0.145)
FI	-0.022 (0.026)	-0.042 (0.028)	0.063 (0.033)	0.019 (0.046)	-0.226*** (0.058)	-0.081** (0.027)
FSA	-0.026 (0.054)	-0.043 (0.058)	0.014 (0.067)	-0.390*** (0.093)	0.234 (0.120)	-0.041 (0.056)
GDP	0.506*** (0.094)	0.905*** (0.102)	0.503*** (0.117)	0.196 (0.163)	-0.331 (0.209)	0.465*** (0.098)
URB	0.411 (0.269)	0.064 (0.292)	-0.052 (0.337)	3.225*** (0.468)	-1.133 (0.600)	0.858** (0.282)
OPEN	-0.893*** (0.191)	-0.926*** (0.207)	-0.822** (0.239)	-0.081 (0.332)	-0.193 (0.425)	-0.942*** (0.200)
_cons	3.669*** (0.640)	-0.807 (0.694)	2.235** (0.801)	4.171*** (1.113)	9.065*** (1.426)	3.795*** (0.670)
N	70	70	70	70	70	70
r2	0.913	0.937	0.892	0.942	0.806	0.895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 t 值，***、**、*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 5.12 可知，甘肃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市样本的回归结果其拟合程度要比全样本回归结果的拟合程度更好，所有模型的 r2 数值都超过了 0.8，回归结果也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似，在模型（1）（2）（5）（6）中核心解释变量与六个被解释变量均是在 1%的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回归系数也普遍大于全样本回归结果的系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甘肃省经济发达的地市，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但与经济欠发达的地市相比较，其助推作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这说明在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在助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地区异质性。究其原因，可能存在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发展阶段不同，事物的发展都会经过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必然会从快速发展过渡到稳定增长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边际效用是在不断递减的，经济发达地市的农民更早也更容易接受信贷帮扶，农户小额信贷在这些地市早已开始发展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水平，因此在经济较发达的

地市,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就不如经济欠发达地市的明显。二是农村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经济发达地市与经济欠发达地市的农村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程度更高,金融体系更加健全,金融产品更加丰富,农民的选择也更多,就会导致农户小额信贷所能占据的市场份额有限,从而发挥的作用也有限。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深入剖析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状况及农村居民收入的发展现状，并基于甘肃省的实际发展情况，构建了一套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得到了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指数，同时将其作为回归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回归分析中，本文选取了甘肃省 14 个市州自 2013 年至 2022 年的农村居民六类收入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还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选择了六个控制变量，经过模型构建、相关检验和回归分析之后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总体呈稳定的增长态势，且各地市之间存在差异性。在衡量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时，我们构建了一套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对甘肃省 2013 年至 2022 年这十年间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从全省的总体数据来看，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在进一步分析各市州的具体数据时，可以发现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水平在地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举例来说，2022 年张掖市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高达 0.7352，相比之下，嘉峪关市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仅为 0.3025，两者之间的差距超过了两倍之多。

(2)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总体显著，但对不同类别收入的影响效果有别。实证结果显示，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按不同的收入分类来看，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非农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人均经营净收入有正相关关系，对人均财产净收入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两者都不显著。

(3) 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本文按经济发展水平对甘肃省 14 个市州进行分类，以 2022 年各市州的地区生产总值为标准，按排名将其分为两组，每组七个市州，一组为经济发达地区，另一组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两组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并不一致，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比经济发达地区的

影响要更加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户小额信贷在两个地区的发展阶段不同，因此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不同；二是两个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程度较差，农村居民可选择的金融产品少，相比之下农户小额信贷所占市场份额更大，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也就越大。

6.2 对策建议

由前文可知，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可以促进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本部分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6.2.1 优化小额信贷地区分布，促进均衡发展

由研究结论（1）可知，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发展水平总体呈稳定的增长态势，且各地市之间存在差异性，因此为了优化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的地区分布，促进其均衡发展，政府应综合施策。首先，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是关键，通过设立专项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在信贷发展滞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金融服务点，以及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确保资金能够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并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其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包括增设金融服务网点、提升通信网络建设以及推广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新型金融服务方式，以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信息化水平。最后，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与教育，通过组织金融知识普及活动、设立金融咨询服务热线或线上平台，以及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研发适合农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农户对小额信贷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从而确保小额信贷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甘肃省的农村地区，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6.2.2 细化小额信贷服务，提升增收效果

由研究结论（2）可知，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总体显著，但对不同类别收入的影响效果有别，因此为了深化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服务，并切实提升农户的增收效果，应该细化小额信贷服务。首先，针对农户的多样化需求，金融机构应研发并推广具有针对性的信贷产品，如针对种植业的“种

植贷”或针对养殖业的“养殖贷”，以及针对地方特色产业的“特色贷”。这些产品应充分考虑农户的实际情况和经营特点，以提供更精准、更贴合需求的金融服务。其次，金融机构应提供个性化的信贷服务方案，通过数据分析和市场调研深入了解农户的信贷需求和收入来源，为农户量身定制最适合他们的信贷服务。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还能有效促进农户收入的增加。此外，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和风险管理，确保信贷资金能够真正用于支持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降低潜在风险。这些综合措施可以有效优化小额信贷服务，从而助力甘肃省农户实现增收致富。

6.2.3 加强欠发达地区信贷支持，助力农民增收

由研究结论（3）可知，甘肃省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比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要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小额信贷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以进一步推动这些地区的小额信贷发展。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农户可选择的金融产品较少，因此农户小额信贷在这些地区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和社会效益。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增设服务网点、扩大信贷规模，以满足农户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农户小额信贷的监管和评估，确保其合规运营并真正惠及农户，从而有效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Aku A,Mshenga P,Afari S V,Ochieng J,Yildiz F.2018.Effect of market access provided by farmer organizations on smallholder vegetable farmer's income in Tanzania.Cogent Food& Agriculture,4(1).
- [2] Atahau A D R,Huruta A D,Lee C W.Rural microfinance sustainability:Does local wisdom driven-governance work?[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0,267:122153.
- [3] Audu M L,Achegbulu J O.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the Nigerian experience [J].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2011,3(1):220-227.
- [4] Gonzalez Adrian.Efficiency drivers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The case of operating costs[J].Micro banking bulletin,2020,15(2):221-223.
- [5] Haoran Fu,Angran Fu,Jinlei Zhu.The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Small Loan of the Farmers in the Rural Credit Union[J].World Scientific Research JournalVolume,2020,(6):78-85.
- [6] Irshad A,Bezawit L.2017.Role of microfina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frica-meta analy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7(8).
- [7] Kabir M N , MD Miah, Huda R N . DETERMINANTS OF CREDIT RIS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ISLAMIC AND CONVENTIONAL BANKS IN BANGLADESH[J].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20(1):1-31.
- [8] Kharabsheh B.Determinants of Bank Credit Risk: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Jordanian Commercial Banks[J].Academ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2019,23.
- [9] Mazumder M S U,Lu W.What impact does microfinance have on rural livelihood?A comparison of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microfinance programs in Bangladesh[J].World development,2015,68:336-354.
- [10] Misra Manoj.Commercial Micro-Credit,Neo-Liberal Agriculture and Smallholder Indebtedness:Three Bangladesh Villages[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ume51,Issue 2.2021:330-350.

- [11]Nadew M,Senapathy M.Small Farmers' Agricultural Loan Repayment Performance in Southern Ethiopia:monograph[J].Primedia eLaunch LLC,2023:168-168.
- [12]Peterson K. Ozili.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tability[J]. Borsa Istanbul Review,2017.
- [13]Remco Oostendorp,Marcel van Asseldonk,John Gathiaka,et al.Inclusive agribusiness under climate change:a brief review of the role of finance[J].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2019(12):18-22.
- [14]Rose AG Baptista,Joaquim JS Ramalho.Understanding the Microenterprise Sector to Design a Tailor-made Microfinance Policy for Cape Verde[R].Cape Verde,2019,(25):12-15.
- [15]SHER K.2017.The Role of Micro Credit in Poverty Alleviation.Journal of Poverty,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35(03).
- [16]白志红. 普惠金融背景下的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困境与路径[J]. 农业经济, 2020, (12):103-104.
- [17]曾小溪,孙凯. 扶贫小额信贷精准扶贫落实研究——基于宁夏的调研[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5(04):87-92.
- [18]程娅,李善民. 小额信贷与农户收入增长关系研究——基于PSM模型的经验证据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0, (06):121-124.
- [19]程欣.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及机制构建[J]. 农业经济, 2023, (12):91-92.
- [20]崔巧琳,王晨翔. 县域小额信贷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J]. 技术经济, 2023, 42(07):141-151.
- [21]单光年. 大数据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策略研究[J]. 商业经济, 2020, (08):164-165.
- [22]丁可可,马正兵,王涛. 乡村数字经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空间异质性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05):90-99.
- [23]杜青青.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影响探析[J]. 中国物价, 2022, (11):63-66.

- [24]杜晓山. 我国小额信贷发展报告[J]. 农村金融研究, 2009, (02):37-44.
- [25]杜晓山. 小额信贷的挑战与前景[J]. 中国金融, 2012, (11):35-37.
- [26]冯海红. 小额信贷、农民创业与收入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6, (05):111-119.
- [27]贺立龙, 黄科, 郑怡君. 信贷支持贫困农户脱贫的有效性: 信贷供求视角的经验实证[J]. 经济评论, 2018, (01):62-77.
- [28]胡冕. 湖南省农村信贷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D]. 湘潭大学, 2018.
- [29]胡宗义, 罗柳丹.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6, 37(03):10-15.
- [30]黄惠春, 高仁杰, 管宁宁. 金融素养对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基于内蒙古和山东的调查数据[J]. 江苏农业科学, 2021, 49(12):235-242.
- [31]黄烨炜, 邱俊钦. 农村土地抵押贷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03):95-106.
- [32]贾超.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研究[J]. 农村市场, 2023, (07):88-91.
- [33]李丽慧, 周凯. 农户小额贷款风险问题研究[J]. 全国经济流通, 2021, (17):138-140.
- [34]李明贤, 刘美伶. 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J]. 农村经济, 2020, (06):49-56.
- [35]李牧辰, 封思贤, 谢星.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3):132-145.
- [36]李胜连, 张丽颖. 可行金融能力视域下我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效应评价[J]. 武汉金融, 2022, (12):71-78.
- [37]李文鑫. 恩施州农村小额信贷支农效果分析[J]. 湖北农业科学, 2016, 55(14):3787-3789.
- [38]李秀辉, 李泽翰. 新中国70年农户借贷行为的演变机制与经验启示[J]. 宁夏社会科学, 2019, (06):12-19.
- [39]林思辰. 浙江省农村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D]. 浙江海洋大学, 2023.

- [40]刘芳. 国外农村金融反贫困模式: 实践经验与启示[J]. 世界农业, 2017, (09): 28-33.
- [41]刘赛红, 杨颖, 陈修谦. 信贷支持、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湖南省县域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1, 37(06): 56-66.
- [42]潘晓亮, 李因果. 农村金融大数据下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19, (34): 29-30.
- [43]孙继国, 曹薇.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差距视角的分析[J]. 农村金融研究, 2023, (04): 23-34.
- [44]苏雪, 张莉琴. 中国信贷扶贫政策演变评述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改进思考[J]. 农村金融研究, 2023, (04): 48-56.
- [45]谭伊文, 何广文. 商业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 B 市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为例[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03): 131-135.
- [46]涂爽, 徐玖平, 徐芳.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J]. 农村经济, 2022, (04): 90-98.
- [47]王晨. 小额信贷、绿色生产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D].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2.
- [48]王汉杰, 温涛, 韩佳丽. 贫困地区政府主导的农贷资源注入能够有效减贫吗? ——基于连片特困地区微观农户调查[J]. 经济科学, 2019, (01): 108-119.
- [49]王婧. 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小额信贷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J]. 武汉金融, 2022, (09): 24-30+49.
- [50]王晓曦, 刘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补贴缓解了农户正规信贷配给吗[J]. 财会月刊, 2020, (18): 153-160.
- [51]王瑜, 汪三贵. 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决定与收入增长[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 (05): 145-155.
- [52]汪为, 万广华.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主要瓶颈、实现路径与政策优化[J]. 中州学刊, 2024, (02): 23-29.
- [53]蔚垚辉, 曹宇波, 耿振. 普惠金融体系下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研究——以山西省

- 农村小额信贷为例[J]. 经济问题, 2016, (06):85-88.
- [54]温涛,朱炯,王小华. 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 经济研究, 2016, 51(02):111-125.
- [55]翁辰,朱红根,陈杰. 扶贫小额信贷可以提高农户自雇经营绩效吗[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 (10):38-52.
- [56]吴思宇. 山东省农村小额信贷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D]. 山东理工大学, 2022.
- [57]武丽娟,李定. 精准扶贫背景下金融资本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收入分层与区域差异的视角[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 (02):61-72.
- [58]谢玲红,吕开宇,张崇尚. 中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历史变迁与未来展望[J]. 兰州学刊, 2022, (02):124-134.
- [59]闫杰,强国令,刘清娟. 普惠金融、脱贫人口增收与乡村振兴——来自扶贫小额信贷的证据[J]. 江苏农业科学, 2022, 50(11):245-254.
- [60]杨春红,徐孟晴,罗强. 共同富裕背景下江苏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J]. 农业经济, 2022, (10):107-109.
- [61]尹晓东. 探析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防范措施[J]. 时代金融, 2018(07):109-113.
- [62]余洁,陈宝珍,韩啸等. 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生产性收入的影响——基于地区与收入差异的实证研究[J]. 金融经济研究, 2020, 35(05):96-107.
- [63]袁凯,秦亚冰. 农村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7(09):51-57.
- [64]张丹. 农户小额贷款多头授信成因分析及防控措施[J]. 中国商论, 2019, (06):34-35.
- [65]张良,徐志明,李成龙. 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05):82-94.
- [66]张梦林,李国平,侯宇洋.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金融素养如何防范返贫[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2, 37(02):117-128.
- [67]张宜,刘芸. 扶贫小额信贷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维度与对策[J]. 财会通讯, 2023, (04):129-137.

- [68]张云燕,唐娟莉,张颖慧.乡村振兴视角下小额信贷促进农村妇女增收的路径[J].经济研究导刊,2023,(02):15-17.
- [69]章文光,廖冰武,中慕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小额信贷的普惠化路径探索——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02):89-99.
- [70]赵理.新型小额信贷扶贫的收入效应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7.
- [71]赵萍,王纯杰.农村普惠金融扶贫:成效、差异与审思——基于辽宁省117个贫困村的实证调查[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493(08):103-111.
- [72]周明栋,陈东平.第三方治理对农户信用贷款可获性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2018,(05):111-120.
- [73]纵玉英,刘艳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8,(03):26-31.

致谢

落笔至此，意味着就要和我的学生时代说再见了。与兰财的缘分开始于 2017 年秋天，从和平到段家滩，从本科到硕士，如今已是第七个年头。回首求学二十载，心中百感交集。在此，我要向所有在我求学之路上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人表示感谢：感谢我的导师黄萍老师，感谢黄老师三年间对我的悉心指导；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你们一直在我身后默默地支持我，给予我无尽的关爱和鼓励；感谢我的朋友们，感谢青协的伙伴们，特别是贾小峰同学，不论是在和平校区还是段家滩校区，感谢你们一直帮助我支持我；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女朋友赵玲玲同学，感谢你一路的坚守与陪伴。

最后，祝我毕业快乐！